

亚当·斯密 与現代政治经济学

(苏)查果洛夫 著 晏志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亚当·斯密 与 现代政治经济学

〔苏〕查果洛夫 著
晏智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亚 当·斯 密
和
现 代 政 治 经 济 学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武 汉 地 院 北 京 研 究 生 部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9千字

·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统一书号: 4209·4

定价: 0.50元

译 序

为纪念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二百周年，苏联学术界曾于1976年6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了大型的科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还有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这本关于亚·斯密的专题学术著作，是由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一部分学者集体撰写的。

本书从时代背景、方法论和经济理论等方面论述了亚·斯密的《国富论》；集中地介绍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亚·斯密理论体系的评价；评述了西方经济学界对亚·斯密学说的看法。此外，本书还介绍了苏联等国研究亚·斯密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苏联经济学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和特点。现将本书翻译出版，希望能有助于增进读者对亚·斯密这本著作的了解，以及对苏联经济学界在《国富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和特点的了解。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亚·斯密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或许是有益的。

本书可供科学工作者、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参考。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陈岱孙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他在百忙之中通读了译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唐璞先生仔细审阅了全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对此表示深切感谢。

译文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晏 智 杰

1981.4.5.

目 录

亚·斯密《国富论》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	1
第一章 《国富论》：历史作用·····	17
第一节 亚·斯密及其时代·····	17
第二节 亚·斯密是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 批判家·····	26
第二章 马列主义创始人论亚·斯密 对发展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35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斯密《国富论》 意义的评价·····	35
第二节 列宁论亚·斯密在经济思想史 中的作用·····	41
第三章 亚·斯密经济学说的方法论问题·····	49
第一节 亚·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起点·····	49
第二节 《国富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职能 与规范职能·····	61
第三节 亚·斯密对经济规律的解释·····	69
第四章 亚·斯密对科学政治经济学某些范畴 研究的贡献·····	77
第一节 亚·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和马克思的 评价·····	77
第二节 亚·斯密《国富论》中的资本 积累问题·····	89
第三节 亚·斯密关于国际分工的思想	

与现时代·····	93
第四节 亚·斯密经济理论中的货币·····	100
第五节 资本主义信贷及其发展在亚·斯密著作 中的反映·····	106
第六节 《国富论》中的地租理论·····	113
第五章 亚·斯密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16
第一节 《国富论》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	116
第二节 资产阶级歪曲亚·斯密经济学说的 赝制品·····	127
第三节 论亚·斯密科学著作在现代资产阶级 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庸俗化·····	134
第四节 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家对亚·斯密 著作的态度·····	138
第六章 亚·斯密著作在苏联等国的出版与研究·····	144
第一节 亚·斯密著作在革命前的俄国及 苏维埃时代的出版·····	144
第二节 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对亚·斯密 理论遗产的研究·····	152

亚·斯密《国富论》 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

H·A· 查果洛夫教授

时间是对精神创造的作品最可靠的检验。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已二百年了。围绕这一著作基本思想的所有文献，都显示了时间对它的检验。

《国富论》的历史作用不能片面地估价。它的历史作用首先取决于，这部著作同政治经济学以往的发展阶段相比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对某些老问题有什么新解释，又提出了哪些新问题。它的历史作用还取决于，后来有哪些经济思想流派把它作为出发的基地，以及《国富论》所研究的全部问题在今天有多大意义。这部著作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概括。亚·斯密在这本著作中进行了创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首次尝试，并规定了这门科学的“范围”。马克思指出：“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

亚·斯密继承了前辈的优秀传统，把政治经济学规律解释成“自然的”规律，即客观的、不依人和政府的意志与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望为转移的规律。然而，斯密所说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在斯密看来，这些规律是自然的、符合于人类本性的。

列宁在反对司徒卢威的斗争中曾强调指出“自然”规律思想的巨大的积极意义。司徒卢威诋毁这一思想，并断言它已经“彻底破产了”。列宁在《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说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规律的观念已经遭到破产……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列宁又说：“古典作家摸索了，而且也摸索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自然规律’，不过，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也看不到其中的阶级斗争。……

“但是，关于自然规律的观念，在社会的职能和发展中，却不是趋向没落，而是日益巩固。”^①

“自然”规律思想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主义是个严重的打击。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曾有人企图以唯心主义精神解释斯密学说的某些方面，把他説成唯心主义流派的鼻祖，但这种说法毕竟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因此，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家，在思想上同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心理学派息息相通，他们对斯密及其《国富论》是不太尊重的。

亚·斯密表面上没有把政治经济学同经济政策理论区别开来。他在《国富论》中把重商主义（“商业或重商的体系”）和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学派，斯密把它看作“农业体系”在当时的变种）观点的全部总和称为政治经济学体系。^②此外，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序论中，斯密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也就是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任务。^③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② 参阅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45页。

③ 参阅同上书，第1页。

斯密对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划分，是根据它们各自的经济政策同经济的自然规律相符合的程度。由于十分注意经济政策，亚·斯密的《国富论》以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开端，并且从是否符合“自然”规律的角度评价了各种经济政策。

可见，在分析的进程中，斯密实际上把来自人类自然本性的客观政治经济学规律同经济政策的规范任务区分开了。尽管后者总是研究和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动力，然而把两者混淆起来无论何时都不利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个原理，在《国富论》出版200年后的今天，在列宁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发表65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性。

实际上，斯密承认的只是那些为显现经济自然规律的作用创造条件的规范任务。因此，他对重商主义体系整个说来采取了一种批判态度，认为它“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它“不让各个人在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公平计划下，按照各自的路线，追求各自的利益，却给某些产业部门以异常的特权，而给其它产业部门以异常的限制。”^①

亚·斯密批判地克服了“经济学家”们（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局限性，同时，斯密也高度评价了并实际上完全赞同重农主义者诉诸自然的经济规律的思想。斯密是从下述思想出发的，即只有遵循这些自然规律才能保证真正增加财富。斯密在解释重农主义学说时指出：“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做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狭隘；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29—230页。

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法，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①

亚·斯密对商品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理论对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具有重大意义。他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把使用价值理解为“特定物品的效用，”^②并指出，交换价值量同使用价值无关：“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③。劳动价值论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今天克服某些人还想从效用引出交换价值的错误观念，仍是很现实的。

亚·斯密把生产关系作为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这在现在同样有现实意义，因为也还可以遇到那种认为生产关系只是对商品生产来说才存在的说法。

亚·斯密没有分析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没有从性质上对创造价值的劳动作出说明。不过，他实际上是从抽象掉了具体形式和数量（从上下文看，应为质量——译者）比较的劳动出发的。尽管对决定价值的劳动的解释有许多矛盾，然而，正是《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充分地研究了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列宁据此写道：“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④。

依据劳动价值论，亚·斯密提出了利润来自工人劳动的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4—245页。

② 同上书，上卷，第25页。

③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④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5页。

原理。在分析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的各部分时，他指出，“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①尽管在把利润解释为价值的组成部分的同时，在斯密那里又遇到了另一种解释，即同预期的各种收入一起又成了价值的源泉，但是，他提出的利润源泉的原理至今在同辩护性利润论的斗争中仍有现实意义。好象预料到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会把利润看作工资似的，斯密指出，“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②可见，斯密已十分接近于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了。

斯密没能发展这一理论，然而他为理解资产阶级社会收入的源泉已经提供了许多东西。他的《国富论》乃是系统地说明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划分的经济基础、研究各阶级收入及其流向的尝试。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过这一点。^③单单这些成就足以使《国富论》成为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科学里程碑。

还应当指出对理解这一著作的历史作用有巨大意义的若干情况。

亚·斯密是中世纪经院学派、封建主义经济关系体系以及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者。为放任原则即完全自由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② 同上书，同页。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4页。《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93页。

竞争而斗争，在他那个时期具有进步的性质。列宁说，斯密是“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① 他的经济政策和反封建的要求，在《国富论》中得到了充分的政治与经济论证。

列宁说斯密是“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这是指下述事实，即18世纪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尚未妨碍他们公正无私地研究客观经济规律。而《国富论》正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能做到的对经济制度科学认识的成果。代表社会进步利益的资产阶级，能够大胆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把它看成自然的、即符合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把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尚未看到这一矛盾的发展的形式及其前景。

下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然要研究这些矛盾。李嘉图的著作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他进行了分析阶级矛盾的经济基础的尝试。尽管李嘉图未能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把从经济上阐明各阶级利益的对立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之中这一事实本身，无疑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开始被视为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的表现。

《国富论》是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个成果，它提供了研究政治经济学范畴所组成的总体的范例。同时，这部著作又是把这一整体的各部分系统地组合起来的尝试。亚当·斯密在价值理论上首先提出了（虽然未能解决）这一任务。

由于把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视为自然的制度，斯密看不出使这一制度产生和灭亡的经济发展所必然经过的形式。而历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45页。

史表明，资本主义以前存在过另一种商品生产形式。斯密称之为“原始社会”。他记录了这一事实，却不能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

这一任务在理论上多么复杂，从下述事实即可看出：亚·斯密的直接继承者、伟大的李嘉图，因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实际上企图取消它，甚至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畴去分析最初的商品生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科学地解答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问题，指出无论在历史上或逻辑上（即理论上），简单商品生产都比资本主义生产占先。然而，在现代，这一科学答案实际上未受重视，在某些时候，甚至还被《资本论》的个别注释者所否认。因此，斯密提出的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问题，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

既然斯密未能确切指出各范畴之间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所以，他就把反映现象之本质的不同程度的范畴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研究，对处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同程度的范畴不加区分。马克思把《国富论》的这一特点看作是把两条研究路线结合到同一原理上：内在的路线，即在现象的内在联系上研究经济关系；外在的路线，则是在表面上所呈现的形式上研究它们。^①这便导致了斯密对同一范畴的互相矛盾的解释。

斯密主要著作中的外在路线，就它本身而论，是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是把它看得同内在方法一样重要，甚或以它代替后者，才是不科学的。还有必要强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1—182页。

调指出，马克思把研究方法划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对在下述问题上提高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些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用外在方法代替内在方法，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变质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这些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概念中。对那些把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形式同有计划按比例地组织社会生产混淆起来的辩护论来说，上述的代替成了方法论的前提。

同时，还不能不看到斯密的外在方法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者的外在方法的深刻区别。在斯密那里，外在方法并不排斥内在方法，两者实际上是并存的。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外在方法代替了内在方法。他们在亚·斯密的理论遗产中只找出那些外在的因素，并从中建立起庸俗的体系。他们津津乐道斯密那些个别的庸俗的实质上不是他的整个体系特点的见解；他们拒绝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把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任务混同于经济科学的规范任务；最后，使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不复存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台柱之一萨缪尔森就是这样干的。

内在与外在两种路线的并存，既表现出斯密对科学的公正无私，又说明了他在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上并未完成，而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内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李嘉图的体系说明了这一点。他把各种范畴都归结到一个统一的基础，却否认商品生产形式的发展，否认他所说的范畴必然的形态变化。

马克思对斯密体系中两条平行路线的评论，不仅在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斗争中有现实意义，而且在批判地对

待不久前出现的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成功的尝试上，也有现实意义。由于想论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包括所有实际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想指出这一体系的运动是相互作用的各范畴体系的运动，有时就以单一的方法不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结果把内在范畴与外在范畴混淆起来，事实上取消了体系的阶梯。

当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被新的范畴丰富起来时，总是需要学会把内在序列的范畴同外在序列的范畴区别开来，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国富论》体系的缺点，不仅应被视为首次尝试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幼稚”，而且应被视为科学在向上发展中的每一阶段的艰难。认为社会主义的全部范畴的价值与意义都是相同的人，借口理论接近实际，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阶梯性原理。这无助于它的发展。

不深刻地研究经济发展的经验，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必须反对以空泛的议论代替对实际过程的概括。然而也不应忘记繁琐哲学和经验主义的危险。亚·斯密“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而把它混同于利润。马克思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繁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①应当始终牢记：没有比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东西。

《国富论》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先进的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69页。

所创作的科学文献。因此，它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这一研究任务的回答，不能不带有自己时代的印记以及《国富论》作者客观上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利益的印记。斯密对国民财富问题的研究，是从生产的单个当事人的利己主义同全社会利益可以协调这一点出发的。

不过，在现代条件下，当社会生产效果问题提上日程时，斯密解释国民财富问题的某些方法还是值得注意的。

在斯密看来，财富的源泉是劳动。与他的前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财富增加的源泉的重农主义——不同，斯密克服了使财富得以增加的劳动这一概念中的具体部门的局限。同时，他没有忽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在方法论上重要的是，斯密提出了总的社会劳动划分为生产的与非生产的比例问题，以及把它作为“国民财富”的要素即社会生产效果的要素问题。

这里不去分析和评价斯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重要的是强调指出，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提法，不仅在现代仍有意义，而且变得更加重要了。现在，同非生产领域的扩大有关的一种想法在不断出现，即企图抹煞社会劳动中的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的区别。斯密解释生产劳动问题的某些方面，是反对上述观点的理论上的一种屏障。最后，斯密提出只有同资本而不是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问题，就是把生产劳动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提到了前列。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在从抽象逻辑地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考察它时是很重要的。

斯密关于劳动生产率要素的提法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他从两方面提出这一问题。第一，他研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经济因素。他的学说表达了时代的特点。他说，“有用

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①分工——这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源泉。劳动生产率的物质要素，首先是劳动工具及其改进是生产力增长源泉的问题，斯密并未忘记，不过被放在第二位。

斯密没有局限于技术——经济要素，他还仔细研究了财富增长的社会经济要素。在现代条件下，当提高社会生产效果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当深入研究经营效果的社会经济标准问题成为动员提高生产效率的所有要素，而不仅仅是技术——经济要素的必要条件时，有必要强调这个方面。

亚·斯密认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要素，就是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他明确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各代理人之间利益的对立，看到了企业主（工业家和商人）竭力为自己创造有损于社会的垄断条件。他说：“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往往和公众的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②他指出，企业主（商人和工业家）的特点是限制竞争。他反对限制竞争，反对垄断。

尽管现代垄断和斯密所批判的垄断有很大不同，然而他反对垄断的论据在今天还是有用的。但他提出的用以代替垄断的自由竞争，在现代看来好比是无政府主义。现代垄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化过程中有其固有的基础，用以代替它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以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代替它的资本主义形式。

亚·斯密相信，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就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对生产的单个代理人有利的事情，归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3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2页。

根到底也对整个社会有好处。^①资产阶级对自由竞争所特有的这一信念，在反对中世纪式的垄断的斗争中是完全真实的。

应当强调指出，斯密关于不同程度的利益及好处的提法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受到资产阶级的局限。如果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那么，无论对个别资本家，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衡量效果的标准只有一个——利润率。但它不能成为全社会的标准，要知道，在这里存在的是利益对立的和收入性质不同的各个阶级。

从发展生产力来看，社会生产效果有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标准，它对不同生产方式是共同的。从社会经济观点来看，每个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有的效果的标准。亚·斯密所由出发的那种效果的标准，由于以“经济人”的模式为依据，所以它对那些不以所谓“经济人”的动机为动力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现实的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经济效果的标准，是以计划化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的。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效果，不能看作是个别企业效果的简单成果。同企业经济活动的核算形式有关的局部的标准，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经济标准，这是两个序列的现象。其中占居首位的，不是局部的标准，而是作为一个有计划整体的社会生产的标准。

经济学的基本收获之一，就是把经济政策同政治经济学划分开来。因此，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在今天比亚·斯密生活与活动的时代更为迫切。

这里显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私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斯密坚信个人的主动精神是无限的，但也不排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第25页。

除国家参与创造物质财富的某些部分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这里所指的那一部分，在最新文献中被称为基础结构。斯密指出，诸如桥梁、运河、港湾等设施，“对于整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如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①

有时人们把斯密的提法同凯恩斯的提法加以对照。然而，凯恩斯是完全从另一种观点提出问题的。他认为，私人企业制度，不仅在生产的某些个别领域不能自行再生产，而且在各个生产领域中，由于内在经济规律的作用，它都不能自动地再生产。因此，在凯恩斯看来，必须有外部的即来自国家的干预，才能保证持续再生产。可见，在自由企业的基础上实现财富增长的思想受到了怀疑。而在斯密那里，私人企业制度并未受到批评，他所说的仅仅是，哪些设施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并明确指出了这一类设施。因此，斯密和凯恩斯关于国家与自由的私人企业作用的提法有原则的不同。

斯密认为，私人企业不要国家的任何干预即可完善而可靠地使财富增长，因而要维护它。而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认为，私人企业结构的狭小这一缺陷，使其不能自由地再生产。但凯恩斯主义者是以维护私人企业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宣传要创造一种手段，持久地帮助私人企业的维持和生存。整个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中的绝大部分，在要求比两百年前无比广泛地干预经济过程的同时（甚至那些提出资本主义计划化思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包括在内），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私人企业制度。可见，现代资产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84页。

阶级经济学有着深刻的矛盾：承认私人企业本质上无能扩大再生产，同时却又要辩护性地维护它。这个矛盾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同私人企业制度之间的矛盾。

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在当代还有另外一些方面。如果说，在自由竞争时代，国家及其活动是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成分起作用的，那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则使国家职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斯密对他那个时代的国家的作用作了正确地说明，即首先是保卫资产阶级私有制。但是，当国家作为经济政策的主体出现时，它仍继续作为上层建筑的成分起作用。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的任务在于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在第二种情况下，在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国家的任务在于从外部干预经济关系，但不是为了成为生产关系的主体。

作为经济政策的主体，国家象往常一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因素，是基础以外的东西。然而社会化过程（特别是在垄断形式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如果没有国家对垄断资本再生产经济过程的直接干预，便不能解决。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解决经济政策任务，便把资本投到某个部门，从而成为经济的以及再生产过程的直接代理人，也就是说，国家具有了新的基础的职能，在作为经济政策的主体发挥上层建筑职能的同时，开始履行作为生产关系主体的基础的职能。这是来自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是国家本身的进化。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职能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社会主义改造的出发点既是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国家所有制（它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可避免的形式），所以国家就成为生产的直接管理者和生产关系的主体，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社

会生产过程。管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应属于基础方面的职能。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起着上层建筑的作用，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定根本的经济政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国家本身也起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管理者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所必需的管理形式，是在全国范围内生产组织的计划化。国家是作为计划化的指导者和生产的领导者出现的。国家投入运转的是归它所有的物质生产要素，以及社会全体成员中有关的劳动力，所以国家的职能属于基础方面的职能。可见，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一方面是作为经济政策出现，因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直接组织者，它又是基础的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的经济政策调节着生产过程的计划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和在全国范围内生产的计划组织实质上是同一意义的现象。制定根本的经济政策措施，是以党的经济战略为依据的。同时，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计划组织的方针也要依据党的经济战略所认可的原则。经济战略总是上层建筑的现象，但在第一种场合是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第二种场合是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作用。

在纪念《国富论》200周年时，我们不仅要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代表者之一的著作表示敬意——英国古典经济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反复钻研《国富论》，会使我们更清楚地领悟到，正是马克思主义回答了那个时代先进的社会思想所提出的问题，认识这一回答的创造性特点。

揭示《国富论》同其前辈经济思想的联系，以及同政治

经济学后来的发展的联系，是深化我们的理论知识的途径之一。运用马列主义创始人在分析这一著作时所发挥的理论与方法，乃是进一步提高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水平的因素。这种研究会促进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顺利解决经济科学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我们的经济学越发达，对经济发展的科学论证（首先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作用就越大。在此基础上，首先就能够富有成果地从理论上拟定经济政策、管理、计划化与经济刺激的措施。

围绕着《国富论》思想的斗争，同现代整个意识形态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强调指出亚·斯密的进步的原理，揭露其资产阶级局限性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缺点，并且指出，亚·斯密学说的真正科学的原理，在当代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完成。

第一章 《国富论》，历史作用

第一节 亚·斯密及其时代

A·B· 阿尼金教授

1876年，亚·斯密的著作《国富论》问世一百周年时，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举行过隆重的庆祝活动。在主席席位就座的是不列颠王国首相，贵宾是法兰西共和国财政大臣。这样大肆庆祝是可以理解的：斯密著作百年纪念，正赶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而斯密本人正是一位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理论家。斯密学说的这个方面，对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特别富有吸引力。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百年，世界大不一样了。斯密象以往其它的伟大思想家一样，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所独占的财富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庆祝《国富论》200周年，是在经济困难，过去的经济和社会理论使人失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发生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对斯密的思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只有回到亚·斯密去，回到自由竞争和价格竞赛中去，才能使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下去。另一些人却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计划化，减少市场和价格的自由竞争，扩大国家调节。这些人

还认为，把斯密说成自由竞争的拥护者是不对的。这些争论，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见分歧，但近年来对斯密的兴趣越来越大却也是事实。

亚·斯密生活与活动在18世纪。不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斯密的个性，便不能深刻理解他的经济学说及其主要著作的思想。学者的内心世界同他作为一个人是分不开的。阐明斯密（既是学者又是人）的个性，早就引起了研究家和经济思想史家的兴趣，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地位太重要了。

1876年，即《国富论》问世一百年后，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伍德·贝浩特写道：“人们对亚·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说了不知多少，而对斯密本人却谈得很少。问题不仅在于他是最有特点的人之一，而且在于，不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也就未必能够理解他的著作。”^①从贝浩特说了这番话以后，对斯密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发现了一些早期的为人所不知的材料，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创作与活动。但是，戈莱教授（关于斯密思想的一本近期著作的作者，苏格兰人）在1948年时仍很有根据地指出：“亚·斯密是18世纪如此著名的杰出学者之一，到了19世纪，对他的祖国和全世界仍然有着巨大影响。相比之下，我们对他的生平详情的了解少得叫人吃惊。”^②

即使在今天，材料仍然不足，斯密作为一位学者和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的个性，还是模糊不清的。因此，研究他的创作与性格，仍有许多疑难。

亚·斯密非常谦虚，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很内向。他的书信极少，即使在当时（18世纪）看来也是令人惊异的。他的

① W·贝浩特：《历史论文集》，纽约，1966年，第79页。

② A·戈莱：《亚当·斯密》，伦敦，1948年，第3页。

同时代人伏尔泰或富兰克林的书信数以万计，而斯密的通信和著作加在一起也不很多。他对写信有一种病态的反感。他的通信格外简短，同时代人回忆他的文章也极少。他有才干，但不引人注目。因此，现代的回忆录作者们，对早已被忘记的18世纪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写了许多，但对斯密通常却保持沉默，或者把某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见丢开了。此外，斯密去世前几天，曾让友人来家烧掉了他的全部文稿，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些文稿的内容。

亚当·斯密是他那个时代的优秀人物之一，他提出的思想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他生活在资产阶级还是反封建的上升阶级的时代。他不是资本主义的浅薄的辩护士，他看出了这一制度的某些缺陷和矛盾。因此，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象当初提出时一样，仍是有意義的。

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使斯密的思想得以形成，并在他著书立说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状况的特点。

18世纪60—70年代，英国经济处在产业革命的起点线上。农业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土地耕作上，出现并实际采用了第一批金属工具，改良了农业技术，农村产品增加了。农业提供了剩余产品，从而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从事工业和实现资本积累的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中出现了重要发明（例如用焦炭混合生石灰熔炼铁矿石）。资本积累规模扩大，积累率和投资效率提高，投资中相当大的份额投在物质生产领域。

然而，工业中占优势的生产方式是手工工场。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其说是运用机器，不如说是依靠改进分工。后者基本上是以旧的没有根本变化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为

基础的。正因为这样，斯密才把社会分工过程看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在他看来，技术的发展同分工密切相关，而且是分工的一个方面。因此，机器与其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独立因素，不如说是发展与扩大分工可能性的辅助因素。斯密完成了反映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特点的经济理论。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的理论。^①

从《国富论》可以看出，斯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很感兴趣。他一开始就准确地描述了有名的制针工场的工艺，并以此为例，用对生产过程的详尽知识，证明了分工的优越性。他强调只有通过各部分工人之间的分工才能提高生产率。在《国富论》的其它部分，我们还可看到他对18世纪技术过程和生产工艺特点的许多叙述。斯密和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的交往与友谊是很有代表性的。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时，斯密是那里的“道德哲学”教授。瓦特对斯密很尊重，把他看作老师和自己事业的鼓舞者。斯密以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蒸汽机的前景。1763年，瓦特刚开始自己的试验时，斯密就在《国富论》最初的草稿中谈到蒸汽机将会有广阔的前途。

亚·斯密最亲密的朋友，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他是一位伟大的苏格兰学者，恩格斯称他是现代化学的鼻祖之一。

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和社会理论对斯密世界观的形成发生了巨大影响。他是启蒙思想的伟大表述者。启蒙的基本内容，是新生的进步资产阶级反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斯密世界观的根本特点是热爱自由与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2页。

道主义，这在《国富论》中反映出来。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思想的统一。它使斯密著作吸引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特别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农民革命者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为了实现这一纲领，他们利用了西方思想家的最进步的思想。在斯密那里，吸引他们的是自由主义社会思想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断然谴责奴隶制（农奴法），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压迫以及实行普遍税收制以便发展工业等等。

十二月党人最大的经济学家图格涅夫，在他的反农奴制的著作《税收论》中指出：“无论是一般政治的，还是国民经济的和财政的规则，都由不朽的斯密及其追随者们提出并且作了论证。”^①斯密对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在别的地方也有所表现。在十二月党人对一次调查询问的回答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询问的问题是，谁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倡议者？他们除了提到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以外，多次填写了亚·斯密的名字。他们还多次提到一般政治经济学著作，这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亚·斯密体系。

提一下《国富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推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有意义的。甚至在斯密的祖国——英国，在法国革命时期，也有许多右翼人物对他的著作采取否定态度。上议院就有一种议论，说法国革命思想曾受到不列颠人亚·斯密的鼓励，他应因此受到谴责。这是谬见，但也表明理解下述事实，即斯密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资产阶级的。

在《资本论》的一个重要注释中，马克思曾指出，斯密

^① H·И·图格涅夫：《税收论》，1819年，俄文版，第15页。

如何受到英国教会、神甫和地主的攻击。^① 斯密在世时即被称为无神论者，被看作宗教的敌人。《国富论》在欧洲其他国家也遇到不少阻力。在西班牙，这本书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禁止。在德国，反动教授们直到19世纪都不愿采纳斯密的学说，尽管他的学说整个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可见，推行《国富论》以及它影响学者们的历史过程，反映出斯密的学说具有进步的民主的色彩。

亚·斯密1737—1746年在格拉斯哥和牛津大学期间已经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在英国的学者中，他特别受到霍布斯、培根、洛克、牛顿和休谟的影响。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对斯密观点的形成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政治经济学中，亚·斯密把威·配第以来英国古典派代表者的思想加以概括，并且搞成了一个体系。他以很尊重的口吻说到配第，尽管对《政治算术》一书（运用统计方法的经济著作）采取了某种批判的态度。他对低估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重商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魁奈和杜尔阁为首的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则是他的盟友，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个人交往给斯密以重要的影响。

苏格兰的影响也有重要意义。18世纪的苏格兰尽管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独立国家。它有自己的管理制度，特别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苏格兰的环境对斯密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

18世纪后半期，当英格兰的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时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678页。

候，苏格兰也大大前进了。苏格兰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在这个时期比整个不列颠更快一些。它的文化出现了巨大高涨。苏格兰的大学以思想自由、注重世俗科学和实践倾向而著称。小苏格兰在几十年间造就了一大批出色的很有影响的人材。瓦尔特·斯柯特是其中最后的一位，他认识斯密，对斯密还作过有趣的评论。

在斯密思想形成中，还有一条重要的路线，这就是美国的影响。在斯密看来，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命运如果不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斯密对国际经济关系许多问题的考察都是以此为例的。他同18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有亲密的交往，富兰克林即是其中之一，并且受到后者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上，特别在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上，富兰克林的著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①

亚·斯密的学识似乎包罗万象，这在18世纪是不奇怪的。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物往往既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文艺作品的作者。斯密的活动实际上包括了全部社会科学，甚至还越出了这一范围。他还有关于自然科学史的重要著述。斯密如此渊博的知识以及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对于评价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应当指出，斯密的经济学说同牛顿的机械唯物论之间的联系。斯密对牛顿的天才是极为钦佩的，认为牛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牛顿关于世界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械体系的观点，同斯密关于人类社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45—47页；第23卷，第65页。

会的观点以及他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即可趋于平衡的巨大体系的学说，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现在，英国有亚·斯密著作和通信的第一个完整的版本。这个版本反映了资产阶级学者对斯密的看法，应当予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它又是斯密著作的最完善的科学版本，其中首次发表了一些早期的人所不知的著述，特别是近年来所发现的讲义底稿。这些材料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对斯密当讲师和教员时的了解。这对于科学研究是重要的。

在我们称为教授法和科学表述法方面，斯密也作了许多事情。他所提出的某些原理，至今仍是有意义的。他在一本书中曾很有根据地强调说：“文体的完善，表现在以最简洁、流畅和准确的形式表述作者的思想。”^①他在自己的写作和讲授中始终遵循着这个精神。

亚·斯密在格拉斯哥时的两位学生杰尼茨基和特列亚柯夫，后来成了莫斯科大学的第一批俄国的法学教授。可见，早在《国富论》问世以前，斯密就同俄国有了关系。杰尼茨基是一位大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远在1772年，即《国富论》出版前四年，他就称斯密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对当时欧洲的思想来说是很不简单的。^②

亚·斯密的著作证明时势造英雄，由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学，到了有必要把已有的知识整理成一个体系的阶段。在斯密著作中，政治经济学首次具备了作为一门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的科学的特点。

① 转引自：《论亚·斯密》，A·S·斯金纳，T·威尔逊编，牛津，1975年，第23页。

② 《18世纪后半期俄国思想家著作选集》，莫斯科，1952年，第256页。

亚·斯密是一个人，又是一位胜任愉快的学者。他把抽象思维和对具体事物的生动描述的杰出才能完善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有极为认真和科学的诚实态度。他善于利用别人的思想，也长于批判和独立思考。他有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勇气，又有哲学家的条理。

亚·斯密的学说反映了正在成长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根本没有追求为资产阶级统治进行辩解的目的。只是在资产阶级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意义上，他才为资产阶级说话。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18世纪后半期，还没有别的社会力量能够实现这一历史使命。

亚·斯密同情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倒不是对穷人的伤感，而是出于冷静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李嘉图的前驱。斯密反对有害的童工劳动，他谈到资本家的贪心迫使工人进行使人愚笨的畸形方式的劳动。

亚·斯密看到了资本主义对劳苦大众来说许多不人道的极其有害的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还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界限。他把这种界限同下列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劳动群众物质状况的恶化（这是紧跟在资本主义进步发展时期以后必然出现的）；由于利润率倾向下降，削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动力；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人们越来越远离劳动以及道德的堕落。斯密没有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去寻找摆脱这一绝境的出路，而只满足于看到上述各种因素会对遥远不定的未来发生深远的影响。斯密自然看不到能以改变资本主义（他称为“商业社会”）发展中的消极社会经济倾向的反资本主义力量。正象美国学者海布洛涅尔所说，斯密关于人们追求改善自身状况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论题，“一点也没有暗示，紧接在商

业社会之后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①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是在18世纪空想的形式上，对斯密也是异己的东西。他同情工人阶级，却没有从他们的斗争中看到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在估计社会发展趋势时，表现了他的洞察力和人道主义。

最重要的是，亚·斯密的许多思想和见解会导致这一思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地主剥削了雇佣工人的劳动。斯密以自己公正无私的科学分析为反资本主义的结论和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变革培植了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斯密创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亚·斯密著作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第二节 亚·斯密是封建主义 和重商主义的批判家

Ф·Я·波梁斯基教授

亚·斯密的学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是一条真正的分界线。斯密坚定地站在经济实践的真实关系的基地上，解决了他那个时代迫切的经济问题。说明至关紧要的经济政策问题占了他的名著《国富论》的大部分。同时，他在这部著作中也深刻地研究和出色地阐明了自己的学说，这一学说为整整一代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确切的经济政策纲领。斯密更出色的才干，还在于他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批判。批判封建主义是斯密的大功劳，是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新思潮的杰出成就。

^① 《论亚·斯密》，第533页。

亚·斯密把农奴制看作资本积累的对立物，他多次提到封建城堡居民的浪费行为。他指出，贵族富翁的特点是纯粹的消费，并把它同商人资本加以对照，后者进行投资是为增加利润而不是为消费。他强调指出，对服务的开支不会得到偿还，因而是一种浪费。而资本投资则能得到偿还并带来相应利润。

《国富论》第三篇中，专有一章分析抑制古代欧洲（实则指封建主义欧洲）农业发展的障碍。在这里，他坚决谴责了维护贵族特权的封建贡赋，说它是一种阻碍农业发展的“野蛮的制度”。他还指出，修筑和保卫城堡，消耗了改良农业所必需的资金。尽管农奴制比古代奴隶制更进步，斯密仍坚定地认为，农奴制度抑制了农业发展，因为中世纪的农奴无权支配财产。斯密谴责遗产继承权和地产税，因为后者妨碍资本积蓄到农民手上，并且“几乎等于禁止农民把积蓄投资于土地”。最后，他反对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对谷物贸易的限制（禁止出口小麦等）。按斯密的说法，市民自然十分痛恨封建主，但积蓄在“乡村勤劳居民手上”的资本却在城市中追求自己唯一理想的避难所。他认为，只有都市商业能促进农业发展。因为“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业家，而乡绅则是胆怯的事业家”。商人支出货币是为获得利润，而乡绅很少敢于这样使用货币。只有商业和产业才能在农业上建立起秩序、合理的管理、自由和安全。

亚·斯密在分析生产劳动时，坚决谴责了封建主义及其随从的寄生性。他指出，“家仆的维持费是不能收回的”，因此，维持为数众多的家仆势必贫穷下去。其次，“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层”的代表（君主、官吏、军官、神甫等），象家仆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亚·斯密反对中世纪典型的人头税，因为当这种税开始按照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征收时，它“完全具有任意的性质”。他建议对奢侈品征税，因为它不会引起其它产品价格上涨，只是使爱奢侈者成为纳税人。在批判法国的税制时，斯密把它同英国的资产阶级税制加以对比，并主张取消人头税，实行其它一些改革。

因此，斯密的经济纲领具有反封建性质，批判的锋芒指向英国的封建残余。在英国，继封建时代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农业，很有利于贵族以地租名义攫取巨额剩余价值。

亚·斯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当时还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欧洲大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法国正走向革命，斯密关于封建贵族寄生性的见解，听起来就象是一个革命的号召。在德国、波兰、俄国和其它许多国家还继续保持着陈腐的劳役经济的统治。斯密明确指出，劳役制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而自由雇佣劳动则是优越的。正是这一反封建的倾向，使斯密的经济纲领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斯密在批判封建主义时，并没有提出任何革命的要求。读了他的书就会得出这个结论。他没有要求消灭英国的大地主和欧洲的封建余孽。从法国反封建革命的问题和思想来看，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很温和的。这种批判具有明显的反历史主义特点。他把农奴制看作古代奴隶制的变形，不把封建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阶段。这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

作为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亚·斯密同重商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者是维护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人利益的。批判重商主义在斯密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批判从反面论证了他的经济纲领，而且是非常富于雄辩的。按斯密的解

释，同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他认为，重商主义完全是中世纪的胡说和封建制度的产物。这种看法更增强了他批判的感召力。

对重商主义观点的批判早就开始了。诺芝和布阿基尔倍尔已经作了不少批判。重农学派继续了这一事业，并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了明确地论证。斯密发展了这些思想。不过，他和重农主义又有很大不同。如果说，重农主义者是以谷物出口者和奢侈品消费者的观点批判重商主义（他们要求取消使地租增长的对谷物贸易的限制），那末，斯密首先感兴趣的是工业的命运，并且站在产业资本立场上批判重商主义，这就使他克服了重农主义在批判重商主义方面的局限性。

亚·斯密指出，重商主义关于货币作用的偏见，来自货币的两种职能：货币既是交换工具，又是价值尺度。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发财就是得到货币”。地理大发现时期，西班牙人一到美洲首先追求的就是金银。斯密认为，重商主义者的下述观念是荒谬的：为了增加一国的金银储备，需要政府特别关心，而高价汇兑将会恶化一国的贸易差额。他同意对外贸易使国家致富的说法，但他要求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斯密断言，致富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用货币进行购买。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工具。即使不能在商品交换中得到金银，“也不至于使国家破产”，只需要采取某些替补货币的措施，而一国现有的劳动与土地年产品仍然照旧。

亚·斯密指出，企图通过输入过多金银的办法增加财富是荒谬的，就象企图“要富人购置多于他们所需要的烹调用具以增加其快乐”一样。烹调用具的数量受着家庭实际需要的限制。同样，流通渠道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货币，“无论何时不容外界干预”，流通工具过多只能导致国民财富的减

少。再说，把商品送往国外市场，总能带回一定利润，而输入金银却不能这样。斯密断言，美洲的发现之所以使欧洲富裕，不是由于输入金银（它的价值甚至还降低了，因而使这些金属“不象以前那样宜于充作货币”），而是由于它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分工和改进技术的机会。和东印度的贸易同样导致了欧洲商品年生产的改善。

在批判重商主义局限性时，斯密写道，社会的全部产业决不可能超出资本额所决定的限度，任何商业条令都不能使产业量的增加超出这个界限。过高估计外贸的作用是不正确的，有经验的商人将经营国内商业，如果利润均等的话。

亚·斯密认为，每个人都能比立法者更好地选择运用自己资本的产业部门，不必政府操心。如果本国产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不比别国进口产品贵，政府的管制就是无用的。如果比外国进口产品贵，这种管制就是有害的。他认为，对每个私人家庭来说是明智之举，在大国的行动中未必就是不合理的。

亚·斯密承认，由于管制，个别产业部门会获得更迅速地发展。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产业劳动的总额”的增加。通过盖温室等办法，苏格兰也可栽种出上等葡萄，但这并不是说，应当禁止输入法国葡萄酒。他认为，从国内市场垄断中最获利的是商人和制造业者。限制外国工业品，只在下述两种场合才对本国有利。第一，对国防所需的特定产业部门的产品，实行高关税和禁止入口，因为“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第二，当对国内某商品课税时，也应对进口的同类商品课税，税额应使进口商品不致比国内商品便宜。

亚·斯密承认关税战（对外国产品征税，以对抗别国的高额关税和禁令）的合理性。英法之间的贸易，即使贸易差

额对法国有利,但两国间的正常贸易仍然是“互利”时,这种贸易对英国也有好处。他把有好处解释为土地、劳动年产品交换价值的增加,而不是金银储备的增加。他指出,认为人民的任务似乎在于使邻国衰落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斯密批驳了退税制,认为它只能使资本离开最有利的部门。他谴责奖励金制度,认为奖励金(奖励谷物出口)实际上是课了两种税。

亚·斯密的批判是十分出色的。他指出,殖民地使欧洲富裕的原因不是金银,相反地,金银价值还下跌了。殖民地对欧洲有利,不在于那里有金银,而是由于它提供了肥沃的土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斯密怀疑殖民政策在经济上是否适宜,这看来有点奇怪,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总是把这一政策同自己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在16世纪^①(特别是后半期),当英国的殖民政策已经有了空前的规模时,响起了斯密的持有异议的声音,他是以国民经济的观点看待经济现象的。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16—18世纪的殖民地贸易中,垄断公司的统治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批判重商主义殖民政策时,斯密指出,良好土地的数量较多以及经营自由是北美新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宾夕法尼亚没有长子继承法就是一例)。他发现,英国的殖民政策限制最少,对经济最有利,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可能。他认为,殖民地贸易垄断会导致该部门资本过多而损害其它部门,破坏各部门之间的“自然均衡”。他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产业被殖民地弄穷了,只有英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才出现了另一种局势。他得出的一般原理是:垄断提高了商品利润率,但延缓了农业的改良。

^① 从上下文看,显系18世纪之误。一译者注。

亚·斯密的结论是：在现代制度下，英国从对殖民地的统治上毫无所得，只有损失。不过，他允许有一些贸易公司，因为单个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经营殖民企业（例如东印度公司）。斯密不理解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同出现勤劳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说他们以艰苦的劳动积累了最初的资本，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实际上，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指出的，这种积累是一部血泪史。斯密不理解重商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本的经济作用。

亚·斯密指出了重商主义的不彻底性。他们阻止工业原料出口，甚至奖励它的进口。他们一直完全禁止毛织品的出口，仅仅降低了一点它的价格。斯密认为，“消费是全部生产的唯一目的”，而在重商主义体系中，消费者的利益总是生产者利益的牺牲品。

在说明自由贸易的信念时，斯密强调指出，用不着法律的任何干预，个人的利益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任何社会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整个社会利益的比例，分配于各种不同的行业。重商主义的限制只能破坏这种“自然的、最有利的资本分配。”

这就是作为重商主义的批判家和自由贸易倡导者的亚·斯密。他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最充分的批判。这一批判是很及时的，并且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分野。这一批判反映了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胜利，反映了英国工业有了异乎寻常的扩张以及工厂主依靠大肆剥削工人而发财致富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已获得决定性的地位。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为工厂制度在英国的胜利作了准备。英国的工商业要求的不是监督与警察的管制。资本需

要的是自由活动的舞台。重商主义政策是16—18世纪专制制度所执行的政策，势必夹杂着封建性质。因此，斯密便把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同对专制制度的谴责结合起来。要求在各生产部门之间自由就业和人口自由流动，反映了斯密经济纲领的反封建倾向。斯密把物质生产利益（“国民财富”的增加即有赖于物质生产的扩大）作为经济政策的标准，这是难能可贵的。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时，号召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斯密创立了完全成熟的政治经济学。他的学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工厂制度下仍是有意义的。这说明，这位著名经济学家不仅看到了过去，而且看到了未来。他能够从当时刚刚开始产业革命的工场手工业制度中，看出即将到来的进一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这显示了斯密的天才和伟大的创造力。

亚·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时表现出高度的洞察力，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把重商主义谬见的产生同货币职能的矛盾联系起来；肯定国际分工的好处；论证了产业的根本利益；把批判重商主义同批判封建主义联系起来。在经济学文献中，时常把重商主义片面解释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流派。但是，当科尔伯特式的重商主义者逐渐转向为专制制度效劳时，他们执行的是贵族的政策，曲解重商主义原则，使之有利于贵族。如果说，17世纪英国革命是在重商主义旗帜下发生的，克伦威尔1651年有名的条例（按指航海条例—译者）是它的信念，那末，法国反封建革命则是反重商主义的。斯密看到了重商主义的封建特点或职能，无疑是他的功绩。诚然，他有时也把重商主义解释为中世纪的某种迷信，这就太极端了。这表明他并不理解重商主义的本质、经

济作用及历史地位。

但是，对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时的独创性也不应作过高的估计。事实上，这位赫赫有名的自由贸易预言家，常常重复自己先驱者的论据。例如，关于商品输出从获得利润的观点来看具有优越性的思想，托马斯·孟早已提出来了。关于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的论题，威·配第已作过出色的发挥。布阿基尔贝尔已经扼要论证了“国富的根源”完全不在于货币。诺芝提出了贸易对所有参加国普遍有利的原理以及各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利益的原理。斯密重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认为这些规律可以导致社会和谐，但重农主义早已对此作过认真的宣传。在批判重商主义的某些方面，重农主义甚至更深刻，因为他们利用了等价交换的命题。而斯密却没有利用它，尽管这一命题从他的价值论中可以直接引伸出来。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生产劳动学说。这使他对重商主义批判的理论内容显得很贫乏。

亚·斯密把自由贸易制度的推行当作是社会和谐的实现，认为这一制度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好办法，这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和市民阶级的幼稚。他把自由贸易政策说成对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唯一可能的最合理的政策。斯密甚至还想到了穷人，强调了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他只论证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扩张的合理性，从而在思想上解除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的武装。英国通过不等价交换剥削农业国，但斯密却说，国际贸易在任何条件下必定对双方都有利。不过，斯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经济史的伪造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能够作一个忠实的捍卫者，他真心实意地相信，甚至在雇佣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如狼似虎的法律制度下，自由贸易也会导致社会和谐。

第二章 马列主义创始人论亚·斯密 对发展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斯密 《国富论》意义的评价

B.C. 维高斯基教授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亚·斯密看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派的代表，这种看法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一八四三年底，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称亚·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①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解释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经济基础时，却始终是从亚·斯密的理论出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表明，直到一八四七年，他才克服了自己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否定态度，不过还未批判地改造这一理论，也还没有创立自己的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涉及的是一般方法论问题，首先是资产阶级理论所固有的反历史主义，以及他们企图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的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01页。

到1857—1858年，马克思才批判地改造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论。这时，他已创立了自己的价值论，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并把商品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

在历史—批判分析中，马克思总要追寻经济观点的阶级根源和方法论根源。同时，他也从这样一点出发，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某个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决定于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实际。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序言中指出，“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如果它“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①在这个意义上，亚·斯密的理论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后期大体上相吻合，这一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当时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在指出斯密理论中的重农主义因素时，马克思解释说，同重农主义一样，它们“反映大工业的史前时期……”。^②他指出，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内在矛盾背后，总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家和斯密研究者的迫切任务，是考察他的整个学说，以便透过它所特有的两重性，^③看到斯密所研究的现实的真实矛盾。例如，斯密对商品价值的两重规定，是以他把劳动的价值与这一劳动的产品的价值相等同为基础的。由于不了解劳动力价值范畴，而根据不合理的“劳动价值”概念，斯密于是就把体现在商品中的物化劳动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等同起来。同时，他所由出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36页。

③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斯密理论中的两重性和矛盾。参阅同上书，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40页。

的是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生产者是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商品交换是等价的（等量活劳动与等量物化劳动的交换），是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

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资料同工人相分离，工人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产品的价值大于“劳动的价值”（如果撇开不变资本，这便意味着 $v + m > v$ ，即一定量工人的活劳动没有交换到等量的物化劳动）。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就在于此。这显然破坏了价值规律。亚·斯密由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财富已不再决定于个人劳动的成果，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价值规律不再发生作用，商品价值不决定于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而决定于劳动本身的价值。

众所周知，马克思作出了相反的结论。不过，亚·斯密的重要功绩在于，他感觉到并记录了（尽管是在矛盾的形式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他的矛盾的观点，在这里显得比李嘉图的理论更富有成果。李嘉图没有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真实矛盾，他只看到斯密理论的不彻底性。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功绩，是“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①这首先表现在劳动价值论上。单是确认价值的源泉是人类劳动，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中的一个时代。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接近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及其产品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00，555页。

性的最后成果……”。^①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密和李嘉图事实上已经注意到了劳动及其产品的二重性，指出“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象亚·斯密一样……，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② 马克思直接继承了这条研究路线。

亚·斯密和李嘉图不仅提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曾把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归结为剩余劳动，因为他们以资本家阶级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来解释剥削工人阶级的起源。他们试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起源，因而考察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基础，这种交换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不过，它只是最一般的表现，应当予以发挥和阐明，以便说明资本主义剥削过程。斯密和李嘉图未能作出这种解释，但是，他们为解决剩余价值起源问题所作的一切，成为马克思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时的出发点。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资本论》的这些卓稿，可以使具体地探求马克思如何批判地克服了他的前辈（特别是亚·斯密）的理论，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大体上是如何构成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确认工人与资本家交换的特殊商品，不是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劳动，而是劳动力。

发现劳动力是商品的过程，从劳动的价值过渡到劳动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00，555页，第197页。

的价值，在《资本论》最初的草稿（1857—1858年手稿）中鲜明生动地体现出来。正是在批判地分析亚·斯密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是商品的见解。他说，“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包含作为自己对立面的雇佣劳动要素，相反，资本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出的。可见，（斯密认为）资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资本只是在事后，在它已经作为资本被当作前提以后，才表现为——这是恶性循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①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以往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就是不能把经济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剥削过程）之物质内容同其社会形式区别开来。马克思在斯密那里看到了这一点。他接着说：“这是因为，虽然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理解为自为存在的生产性，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这正是斯密不同于重农学派的地方，——而不是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立的独特形式规定上的劳动。”^②

也不应陷入斯密的另一个错误：似乎资本家握有别人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指出，“资本不仅象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这就是一切交换价值都是这种支配权而言的，因为交换价值向它的占有者提供购买权力——而且是不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③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指出斯密混淆了剥削过程的物质内容和它的社会形式。斯密没有分析这种社会形式。

马克思对斯密理论批判地改造，在其它一系列理论上也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第46页。

可看到。例如，马克思依据亚·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制定了自己的理论。他在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①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劳动理论。它是对斯密原理的直接发展，同时又是本质上不同的另一种理论。关于分工、原始积累等学说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批判所谓“斯密教条”（把商品价值归结为收入）的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理论同样是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斯密和李嘉图采取的是分析方法。马克思说，尽管他们这样作时曾陷入各种矛盾，企图不揭示中间环节就证明各经济范畴的内在的统一性，但是，“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因为“分析是说明起源，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要前提”。^②

马克思的理论与方法是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与方法之直接的和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和他们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标志着经济科学发展中深刻的质的飞跃。这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解释是完全符合的。他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③只有把对斯密李嘉图理论的“肯定的理解”即作为自己直接的先驱，同时他们必须加以“否定”即必须新的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理论统一起来，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是真正科学地标志着经济科学之革命变革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依靠古典派成果的同时，完全有必要克服他们理论与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56页。

③ 同上书，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24页。

法上的缺点以及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第二节 列宁论亚·斯密在经济 思想史中的作用

E·Γ·华西列夫斯基副教授

在列宁的著作中，亚·斯密的理论遗产占有重要的地位。列宁对斯密的思想遗产及其在社会思想上的作用所作的原则性评价，不仅对阐述斯密的经济理论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作用，而且对解决俄国工人阶级当时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都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对斯密的评价，从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思想斗争任务来看，也是有意义的。总的来说，列宁对斯密的态度同马克思对斯密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列宁是在更近的历史时期评价斯密的，因此其中包含着新的因素，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了斯密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指出它是科学因素与非科学因素的结合。这就导致了经济思想发展中两种潮流的出现。李嘉图接受了斯密体系中的科学因素，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推上新的最高阶段，而非科学因素则成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来源之一。

后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思想被马克思主义所接受。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事业，维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而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照旧利用斯密经济学遗产中的庸俗因素进行投机。列宁在九十年代，即最初从事理论活动的时候，就碰到了这种倾向。它在俄国有两个主要派别：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

列宁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些派别接受斯密体系中的庸俗因素，决不是偶然的。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问题占着中心地位。同民粹派和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方面。围绕这一问题的思想斗争，涉及到同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危机理论有关的几乎所有问题。民粹派为了发挥他们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发展的观念，企图加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斯密《国富论》实现论的错误原理，追溯到他把社会年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的教条（在他的公式中没有不变资本）。因此，斯密的理论遗产，在九十年代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而且具有实践的政治意义。

为了指出民粹派关于剩余价值不可能实现这一观点的错误，必须揭露其思想及理论根源。列宁指出，民粹派的这一观点没有任何新奇之处，那是从西斯蒙第那儿借用来的，而西斯蒙第则重复了斯密在实现问题上的错误。这样便挖掉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大厦的根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列宁对于在当时的思想和理论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的经济思想史是多么注意。必须摧毁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概念，这促使列宁详细研究了斯密的观点。

列宁在九十年代著作中，集中注意斯密经济学说中反映其弱点的那些方面是必要的。不过，列宁同时也强调了斯密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指出，在实现问题的研究上，斯密占有特殊地位，尽管他有错误，并对后来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司徒卢威坚持认为，在实现论问题的历史中，不应详细叙述斯密学说，而应详细叙述重农主义著

作。列宁在反驳这一点时指出：“不，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并不是只限于承认用产品交换产品的真理（这一点重农学派也知道），他还提出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按价值被补偿（被实现）的问题。”^①因此，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实现问题时，用三十页谈斯密，只用两页谈魁奈，决不是偶然的。尽管马克思明白，魁奈的学说包含着对他的时代来说是独创的原理，而斯密在分析再生产的某些方面甚至比重农学派还倒退了。

列宁注意到（象马克思当年所作的一样），亚·斯密的功绩不仅仅取决于他实际作出的科学成就。大家知道，斯密提出了社会资本和产品各个部分的实现问题，但没有解决它，并陷入矛盾之中。不过，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是重要的和有科学意义的。更何况他实际已接近于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分为三部分，按实物分为两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列宁指出，消除斯密在这些问题上的混乱，使马克思得以创立成熟的再生产理论。

从列宁对亚·斯密和一般资产阶级古典派遗产的分析来看，下一个阶段是重要的，这一阶段同列宁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有关。“合法马克思主义”这个派别在九十年代还企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尽管列宁当时已经证明，它实际上包含着自由资产阶级倾向。意味深长的是，列宁认为研究实现问题必须从揭露斯密的错误开始，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几乎所有首领都不理解这一任务。例如，杜干·巴拉诺夫斯基在《英国工业危机》一书中叙述实现问题研究史时，并没有指出如下一点，即后来的经济学家重复了斯密教条，因而不可能解决实现问题。司徒卢威甚至断言，亚·斯密总的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59页。

来说同实现问题无关。这决不是偶然的。列宁说，“合法马克思主义”重复了斯密教条，因此同样不能解决再生产问题。

指出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同过去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特别重要的。这时，“合法马克思主义”已经公开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阵营。列宁在1914年发表了《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书，旨在反对司徒卢威的《经济与价格》。司徒卢威在这本书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还猛烈攻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便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许多科学成就，不过，列宁认为，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提出了关于自然规律的思想，发现了价值规律，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所进行的经济分析。司徒卢威企图抛弃所有这些成就。他否认价值规律，随心所欲地把这一规律等同于“神学家的‘伦理’规律”。其次，他否认一般客观规律的思想，断言这种思想似乎只能使自己丧失信誉，因为资产阶级古典派把资本主义看作自然的和永恒的。司徒卢威显然是想利用古典派的反辩证法和资产阶级局限性来进行投机。资本主义及其规律当然不是永恒的。马克思业已证明了它的经济规律具有历史的过渡性质。但是，资产阶级古典派所由出发的客观规律性的思想本身，无疑是科学的。

列宁以尖锐论战的形式揭露了司徒卢威的意图的真正阶级本质，指出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时又维护了古典派的科学思想。列宁强调指出，司徒卢威反对规律性的思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在新的时代，即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当前的任务时，资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在帝国主义

条件下，资产阶级反对规律性思想，反对科学地分析经济规律，因为这种分析会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列宁的这些思想在当代具有巨大意义，因为攻击规律性思想，在资产阶级思想阵营中是时代的表征。今天，共产党在反对这种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坚决维护着列宁的立场。

列宁致力于阐明斯密经济学说和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上的地位，是非常迫切的。在这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发表的。资产阶级也纪念马克思，但完全是以自己的方式。他们想以纪念他来诋毁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攻击的主要意图之一，是要证明这样一种揣测：仿佛马克思主义同世界的社会的思想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有害的宗派和狭隘的学说，在人类社会思想中没有什么根基。

列宁回击了这种恶意的诽谤。他证明，世界的社会思想的全部经验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烂言：似乎马克思主义处在社会思想发展的一般常轨之外。列宁阐明了具有原则重要性的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在社会科学的决定性领域中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变革。列宁写道，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①

列宁恰如其分地确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以及亚·斯密作为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古典派最伟大代表之一的地位。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2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被列宁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资产阶级思想家一直想把斯密看作自己的资产，利用斯密学说的不足之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到它。列宁指出，尽管资产阶级古典派著作有错误和缺点，但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些因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缺点，而是他们的科学成就。因此，我们有权利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列入世界经济思想的进步的发展范围之内，这一发展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

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书中，把斯密称为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这个提法有原则性意义，因为它准确地再现了斯密思想体系的历史和阶级根源，为评价他的思想遗产提供了可靠的指南。列宁对斯密的这种解释同马克思对斯密的评价是衔接的，马克思认为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依照列宁的说法，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没有表现得那么自私。可见，斯密不仅同业已离开历史舞台的封建阶级思想家相对立，而且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代替了古典派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者相对立。当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说来还处在上升阶段时，抱有成见的辩护，自私地维护资本主义就成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标志。列宁是在一八九八年谈到斯密的，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因此，不仅对以往的封建主义来说，而且对帝国主义时代已变成反动阶级的资产阶级来说，都应把斯密看作先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继马克思之后，列宁在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遗产的分析中坚持了具体的历史的态度。现代资产阶级对斯密的作用及其思想在当代的意义所作的评价是形形色色的，但他们都违背上述的原则。为了替现代资本主义辩护，

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同这一科学原则一刀两断。

一九七五年，美国出版了布鲁克菲尔德的《相互依赖的发展》一书。作者对凯恩斯关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评价很高，并把凯恩斯的“现实主义”同斯密力主把自由的私人企业制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自然秩序”的“经济的幼稚”加以对照。布鲁克菲尔德论断的极端反历史主义在于，他企图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的尺度去评价斯密的思想，而斯密的思想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产生的，他的著作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

同年在美国再版的另一本书《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作者罗曼诺和莱曼）也很值得注意。本书有三章说明当前正在竞赛的三种主要的思想立场：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编者的片面性在于，“激进的”部分没有提到列宁，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被不显眼地同保罗·斯威齐^①和格·马尔库塞^②等人列到一起。而这些人在“修补”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很卖力气的。亚·斯密（同现代“货币学派”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一起）则被列入“保守主义观点”之内。在这个部分，说明的是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他们维护市场竞争资本主义的基

① 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被看作左翼经济学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首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过一些阐释，但在一些根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宣扬修正主义观点。例如：他企图以模糊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经济剩余论”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无产阶级终将觉醒并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等。——译注。

② 格·马尔库塞：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原籍德国。他常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散布分化瓦解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论调。例如，他认为，在现代科技进步，消费增长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失去革命作用，革命主动精神只体现在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和激进知识分子身上。他否认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译注。

础，仿佛它能保障最有效地分配原料和劳动资源，保障“利益协调”和“个人自由”。显然，编者为了以斯密的声望来加固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大厦，禁不住要粗暴地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斯密的思想从维护资本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是为了社会进步利益的时代，随意搬到维护这种基础已是反动的事业的年代。列宁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反对类似的资本主义辩护士。

第三章 亚·斯密经济学说的 方法论问题

第一节 亚·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起点

B·C·阿法纳谢也夫教授

研究亚·斯密经济理论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史中最复杂最有意义的任务之一。揭示这一方法的特点，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形成，走过了多么复杂的发展道路，认识到亚·斯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决真正科学的方法问题的贡献是多么伟大。理解同亚·斯密经济理论体系有所不同的方法论的特点，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其中，关于他的理论的科学起点问题占有特殊地位。

亚·斯密考察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这一考察是通过独特的历史棱镜——工场手工业分工（当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来进行的。马克思说，亚·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①他觉察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特点，而不仅仅是它的部门的特点。

亚·斯密虽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自然的制度），但是，他接近于揭示出资产阶级发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86页注。

致富的秘密。他把劳动理解为价值的创造者和资本主义利润的真正源泉，尽管他只是在剩余价值生产的神秘机构上面拉开了一点帷幕。^① 亚·斯密第一次明确地按照经济标志划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他的旨在反对封建主的寄生性和奢侈的生产劳动学说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的巨大成就，看上去同他的理论的阶级倾向是矛盾的。然而，在他那个时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尚未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而有可能把科学地分析经济过程同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结合起来。这种可能性取决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意识形态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由资本主义在同封建秩序斗争的时代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决定的。同19—20世纪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包括亚·斯密，实际上是把阐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作为自己维护的直接对象，而他们所维护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时还是发展生产力的唯一进步的社会形式，即是社会生产的推动者，并以此为限。^② 这就是说，亚·斯密不是作为辩护士来维护资本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他的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亚·斯密的经济学体系，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把亚·斯密的理论看作自己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尽管它同马克思主义进行着激烈地斗争。^③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5—64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25页。

③ P·E·罗斯托：《亚·斯密—经济科学的奠基者》，伦敦，1965年。
P·A·塞缪尔森：《经济学》，1964年，俄译本，第55，794页。

学家对亚·斯密经济理论的态度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他们力图抨击和推翻亚·斯密的科学发现，阉割它的进步内容。^①另一方面，他们对“斯密革命”几乎都给予高度评价，并号召把古典派理论（包括亚·斯密）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加以综合。^②

亚·斯密经济理论令人惊异的特点，是他的错误理论见解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出现过不少错误的理论结论。其中大部分都被遗忘或是消失了。但斯密的错误见解却不是这样。它以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一再出现于《国富论》问世以来 200 多年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文献中。例如，大家知道，所谓“斯密教条”（即把社会产品价值等同于收入，从而等同于国民收入）就受到李嘉图、西斯蒙第、俄国民粹派、凯恩斯等人完全地或部分地赞同，也受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首先是新古典派代表者的赞同。

不过，斯密经济学说最使人吃惊的还是它的极端矛盾。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再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象斯密那样矛盾。他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沒有统一的答案。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起点有两种解释。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实际上有两种看法。他提出了两种价值论（加上它们的变形就是四种），两种利润论，三种地租论。他对生产劳动有两种解释，对分工原因有两种观点等等。亚·斯密主要是以其经济分析的科学成就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不过，也不能不看到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人的错误。对这些错误应当

① I. 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E·G·韦斯特：《亚当·斯密》，纽约，1969年。

② 《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5月。B. 塞里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俄译本，第274页。

作出解释，这不仅因为它们是斯密经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它们在经济体系中的性质和作用本身就构成了理论问题。

亚·斯密解释某些经济现象时的矛盾的立场，通常并不是单纯的理论错误。这些立场所反映的，一方面是被考察的现象的外表，另一方面是斯密觉察到的现象的内在内容。因此，亚·斯密对某些经济现象的矛盾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这些现象在经济生活的表面所浮现的外部形式同其内在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作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亚·斯密是最先考察各种经济问题，并为被考察的现象寻求理论形式的人之一。另一方面，作为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努力探索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但他并不理解外部经济形式同经济过程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他把以描述方法所得的结果同以分析方法所得的结果等同起来。于是，同一种现象便有了两种甚至更多的“本质”。

亚·斯密经济理论的矛盾，记录了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和内容的不一致，因而也就提出了对科学来说重要的必须解答的问题。斯密理论的这个特点，多半预先决定了它在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①

试举斯密对资本范畴的定义为例。一方面，资本被定义为由生产所需的原料和劳动工具所组成的“资源”。这里看到的是资本的外部形式。但是，这种孤立的解释从根本上歪曲了资本的社会经济本质。另一方面，资本又被理解为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40—141页。

待从中获得收入的“资源”。这种理解则表现了资本所有者对利润的要求。

亚·斯密明确认识到，雇佣工人的劳动是利润的唯一源泉。他说：“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①斯密在这里把资本理解为企业家对雇佣工人无偿劳动的要求。对资本的这两种解释，提出了资本本质的问题，以及它的外部表现形式同其社会经济本质的相互关系问题。

又如生产劳动问题。亚·斯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持有两种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只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生产的。这在他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和进步的观点。当时，资本所支配的只是物质生产领域，因此，这种解释总的来说正确地反映了生产劳动的内容。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②在亚·斯密时代，资本剥削雇佣工人的领域同物质生产领域是一致的，所以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是生产的。不过，斯密还有另一个生产劳动定义：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在这里，他认为带来利润的劳动是生产的。

亚·斯密的这两个定义远非一致。创造物质商品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符合他的第一个定义。但它并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因此与第二个定义不符。亚·斯密在这里划分生产劳动的方法论标准不同。他的第一个定义，事实上是从劳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426页。

动所生产的特殊使用价值出发的。而他的第二个定义，注意的则是雇佣劳动的另一个特点：它能生产比本身更多的价值。这两种解释显然包含着不同的经济内容。

马克思解决了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矛盾。他指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因此，生产劳动的尺度也是二重的。从简单劳动过程来看，生产劳动的标准，是这种劳动创造某种满足个人或生产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生产劳动就是再生产社会生产力某种（个人的或物质的）要素的劳动。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①因为这个定义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个方面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生产劳动的标准，应是这一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马克思指出，这个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②从这个观点来看，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对于资本主义才是生产的。

然而，把生产劳动规定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又是以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为前提的。实际上，不生产商品价值，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而不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便也不能生产价值。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两个方面，以及生产劳动定义的两重性时指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①

由此可见，亚·斯密对生产劳动的解释，包括他提出复杂的理论问题上的矛盾，显得多么富有教益。上述例证也表明，亚·斯密不能解决他所碰到的这些矛盾。

亚·斯密经济理论的矛盾，记录了但没有解释他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现象的全部总和，同其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基础之间的不一致。这就是说，亚·斯密理论的矛盾不仅包括触及资本主义经济个别现象的个别理论问题。这些矛盾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学面前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任务——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出发，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外部表面的总体的运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证明无法解决这一任务。甚至李嘉图（他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他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由于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也不能阐明“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②尽管他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事情。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制定的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才能肩负起解决这一任务的重担。

马克思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的最大功绩之一，是他为揭示亚·斯密经济理论的矛盾现象提供了一把钥匙。

描述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之交错，是亚·斯密理论的特点。运用这种方法自然会得出彼此矛盾的理论成果。不同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5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3页。

方法的这种交错，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有代表者的理论中。但在亚·斯密那里，这种情形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亚·斯密的经济理论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他的研究方法的两重性是多少一贯的，从而使他不仅在个别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而且在其整体上，都得出了彼此矛盾的理论结论。

基于两重性的研究方法，亚·斯密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时，试图直观地依据商品生产者劳动的二重性。不过这是不自觉的，因为分析的结果非常矛盾。但是，即使是直观地运用劳动二重性来研究资本主义，也是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其它代表者一样，亚·斯密不曾自觉地揭示商品生产者劳动的二重性，没有明确区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作为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不过，在考察资本主义的不同经济现象时，他实际上时而从具体劳动及其产品出发，时而从抽象劳动及其成果出发，这样，自然在同一问题上得出彼此矛盾的理论观点。亚·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的反映，他有意识地接受了劳动的这个方面及其成果。另一方面，斯密又试图揭示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这使他直观地从抽象劳动的角度研究这些过程。

因为斯密没有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理解它们的关系，所以他不能揭示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其内容的关系。在个别现象及其整体上是这样，在研究的起点上也是这样。亚·斯密研究方法的科学上的缺点就在这里。

马克思在考察亚·斯密学说“科学的起点”时，找到了理解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人经济理论矛盾的关键。

大家知道，亚·斯密在社会产品价值构成问题上的立场是矛盾的。在一种场合，他把它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的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额，即国民收入。在另一场合，他又把被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从社会产品价值构成中划分出来。马克思指出：“亚·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他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①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因为看上去有些反常而引人注目：亚·斯密经济理论的矛盾来自他的“科学的起点”。也就是说，斯密的科学成果和不科学的成果即庸俗因素，都来源于他的理论之“科学的起点”。

亚·斯密经济理论的“科学的起点”是什么？马克思对他的研究方法的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起点，在斯密对社会年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析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分析一国年劳动产品时，亚·斯密是从不同的观点进行考察的。第一，他把一国年劳动产品解释为当年生产的使用价值之总和。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②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他看待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他是完全从简单生产过程，从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即从具体劳动的观点来考察一国年劳动产品问题的。

亚·斯密对这种方法并没有作什么精心的论证，而是直观地加以运用的。重要的是，他的这一方法是片面的，因为他只从一个方面（具体劳动）去考察具有两重性的现象。马克思指出，斯密“片面地注意到单纯的有用劳动，诚然，这种劳动使这一切生活资料取得可以消费的形式。”^③正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415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419页。

如此，斯密才仅仅把一国年劳动的产品看作当年生产的使用价值总和，即当作社会总产品。

第二，亚·斯密从价值增长过程，即归根到底从抽象劳动观点考察一国年劳动产品。他还得出结论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加到原料价值上的新价值，一部分形成工资，另一部分形成资本家的利润。工人没有也不可能再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斯密从价值增长观点所考察的一国年劳动产品，乃是当年新创造的价值总额，即国民收入总额。

由此可见，亚·斯密独特的方法论，表现在他片面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时而从具体劳动角度，时而从抽象劳动角度。结果，在考察同一现象时便得出了两种结果。在上述例子中，就导致了社会年产品与国民收入的等同。然而，组成社会年产品价值的是三部分：已消耗的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亚·斯密片面的态度排除了阐明已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在社会年产品价值结构中出现的机制的可能性，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理论结论。

总之，亚·斯密经济理论“科学的起点”，就是从劳动二重性的某一方面直观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这正是他整个理论的两重性的认识论原因，而同这一理论及其变化无常的历史命运有关的种种不寻常的令人费解的现象，也由此得到了解释。因为斯密实际上依据的是经济分析的科学起点——劳动二重性，运用的是直观的方法，所以，他的体系的矛盾带有真实性，记录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同其内在本质的差异，因而使这些矛盾对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显得富有教益。这里，我们说的只是这种矛盾构成理论发展的极重要因素的场合。

亚·斯密经济理论“科学的起点”的性质，可以说明他的理论的某些特点。例如，他的理论错误具有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他从具体劳动所获得的理论成果不是简单的理论错误，而是他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外部形式的理论再现。而且，按照斯密的方法，它们还是作为这些现象的“本质”出现的。大家知道，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外部形式的理论概念具有一种自然生成的特点。因此，斯密的追随者不可能把他的错误见解划分开来，只能重复斯密最先提出的关于某一经济过程通常的非科学概念。

亚·斯密理论的矛盾，无论是其中的科学因素还是非科学因素，都是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合乎规律地形成过程的产物。以商品生产者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的方法，是马克思详细制定并科学地运用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亚·斯密学说所反映的是这种方法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还未揭示出劳动二重性，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所特有的两方面的统一中去理解它的二重性。

当然，斯密的错误见解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生命力首先同它的阶级本质有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企图利用斯密的错误，因为其中所记录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可以使人对它们的本质得出极端错误的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地利用这些错误，抹煞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质及其剥削本质。同时，他们又力图利用斯密的巨大声望，以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的，把他的错误冒充为“科学成就”。

但是，不一定非要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才会犯斯密那样的错误。它们可以出自纯粹的认识论上的原因。每个进行正确的科学思维的经济学家，在自己研究进程中，都要回顾经济科学所经历的全部历史过程。吸取其中

的基本教训，是政治经济学史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

※※

※※

亚·斯密经济学体系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的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因此，他的体系的矛盾也就唤起了分析资本主义的实际科学起点的问题。马克思以其劳动二重性学说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能够最先成功和充分地利用这样一种真正无限的可能性，即把劳动二重性作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的起点和出发点。马克思发现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属于人类天才的最伟大成就，具有永不磨灭的科学意义。

揭示亚·斯密经济理论“科学的起点”，可以使我们明了这一理论的内部结构。这对理解他的学说的历史地位大有帮助。依据片面地运用劳动二重性的方法，亚·斯密得以把过去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成就吸收到自己学说之中，并且制定出多少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体系实际上是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两个体系的复杂的交错。这种交错首先是他所特有的科学起点的结果。这种情况成为19世纪上半叶经济思想主要流派分化的出发点。

亚·斯密以后，发生了古典的和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分化。庸俗政治经济学是这样产生的：它们把斯密理论中的庸俗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且为了替资本主义辩护而利用这些庸俗因素。亚·斯密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庸俗因素被分离出来，转化成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特殊流派。与此同时，古典派在李嘉图（他精心研究了亚·斯密理论的科学原理）的经济理论中，获得了最高发展。亚·斯密经济理论所特有的科学与非科学观点体系的交错，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了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两个

独立的流派（古典派和庸俗派）之间一定的联合与斗争。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向工业无产者的生活提出了挑战，也加剧了小资产阶级的分化。这推动了反映工人运动最初的不成熟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后者最著名代表就是西斯蒙第。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学说成了这个经济思想流派最初的理论资料。

亚·斯密经济理论的科学起点的特点，说明了古典派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继承性的特点。马克思在制定自己学说的过程中，依据的不仅是斯密已经达到的科学原理，而且还有他学说中包含着提出了重要理论问题的矛盾。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①只有革命工人阶级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才担当起这一重任，解决了古典派所遇到的最复杂的问题，创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并用来为劳动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为人类进步的利益服务。

第二节 《国富论》与政治经济学的 分析职能与规范职能

H·П·费多连柯院士

在亚·斯密著作中，论述当时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性，确切些说，解释在生产力的发展转折期所看到的结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论述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为进一步分析研究新生的资本主义成长过程提供了依

^① 参阅：阿法纳西也夫：《亚·斯密理论的矛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经济问题》，1976年第3期。

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前，必须先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基本的起始范畴，确定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新形式，并把已有的知识组织到一个严密的合乎逻辑的体系之中。由于斯密把当时所有的经济知识都揉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中，所以，他的著作便逐渐成为实践的基础，即履行规范的职能。

《国富论》研究方法的两重性，实际上来自斯密对经济理论的作用与任务的看法。在《国富论》的前两篇，斯密把政治经济学（包括当时全部经济理论）规定为这样一门科学，它研究现有社会之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而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规律性。在这里，他考察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原因，产品在社会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分配，资本的本质及其逐步积累的方式。

在《国富论》第四篇，斯密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原先的对象，把原则上崭新的一些东西也包括进来了。斯密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应当在客观地分析经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实际的任务，即论证和推荐那些能够保障人民增加收入和改善生计的经济政策。这表现出斯密试图运用经济科学的规范方面，发挥它作为采纳解决方案之根据的积极作用。

亚·斯密论证了“经济人”这一概念，它是斯密理论体系的根本要素。“经济人”活动的主要动力是个人利益，而要满足个人利益只能通过同别人交换服务。斯密从这种使人们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利益之中引出了分工，而分工则被视为增加国富的首要条件。斯密在这里提出了人类活动的刺激因素和动力问题。

经济活动的刺激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迫切问题。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

算……”^①

亚·斯密认为，人是个人利益的凝结物，而社会则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个人混乱而贪财的活动保障了秩序与和谐，导致了普遍的丰裕与经济增长。从问题的这一提法，可以看到早期把总体的和局部的最优化结合起来的方式。这种结合，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经济实践上都是当今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在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是斯密的无可争辩的功绩。

此外，斯密的著作包含着创立经济结构的具体建议，这种结构应能最大限度地把局部利益之总和同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恰当地结合起来（即设法使个人利益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自然秩序”，经济自由，促进了最有效地实现自发经济规律的作用。

《国富论》的基本思想，对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开明贵族的经济观点的形成发生过影响。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有远见的托利党人，19世纪初普鲁士的反对法兰西改革者和拿破仑的一些战友，都曾从《国富论》中得到过启发。英、法和西欧其它国家近百年间的经济政策，都是依据斯密所阐述的原则规定的。原因可能在于，斯密在他的理论中作为基本的东西挑选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具有长期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历史时代都曾提出过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然而，只有在现代，才可能根据经济理论的成就，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切实地予以解决。

亚·斯密的“经济人”无论如何不是孤立的生产者的模式（“罗宾逊”），象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通常解释的那

①.《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第39页。

样，而是商品生产社会经济体系的一分子。按照斯密的看法，在这个体系中，相互联系的结构的作用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他强调说，独立的经济个体，虽然追求个人的利益，但由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作用，必会导致普遍的福利。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要点。按照这一理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只能损害“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损害社会的利益。斯密认为，国家的作用应限于保障对外防御和国内安全；只在例外场合才从事个别企业家无力经营的经济设施。

“斯密原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理由在于，在民族的（后来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规律性：在全国范围内（社会化生产），在不存在来自某个权力中心的监督与管理的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就可以使生产和千差万别的消费保持一定的协调。这种自发调节的矛盾与缺陷，诸如周期性危机，大量失业，两极分化，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统治等等，是很久以后才暴露出来的。而在斯密时代，下述事实曾使很多经济学家充满信心，甚至使那些远非为资本主义直接辩护的人也感到钦佩，即谁也没有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意识的指导，但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垮台，而且能够胜任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攻击（例如，在“谷物条例”时期，保护主义者反对自由贸易主义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主要来自没落阶级（土地贵族）。

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以后，情况迅速地起了变化。日益明显的是，自由放任的资产阶级企业制度，已经不能长久地坚持社会经济的有效职能了。但是，斯密经济政策理论的逻辑如此严密，观念如此完整（它曾博得庸俗经济学家多方赞扬，19世纪最后三十年间出现的数理经济学派的模式更加强了它的力量），以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不愿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危机、失业）的一贯性和普遍性，只承认存在着正常过程的局部和偶然的破坏。

只是到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和张伯仑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才正式承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固是合乎规律的，从而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有系统地调节，要求从意识形态上论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彻底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只能通过经济实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

亚·斯密的经济政策观念（“经济人”、“看不见的手”），作为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高涨时代的理论反映，同时也提出了经济管理和调节的重要的一般历史问题。这是经济个体、单个生产单位同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监督和作出决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把国民经济的（社会的）各种需要和任务（通过局部的经济利益和动机），间接地下达到这些个体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一般历史内容并未消失，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又表现出来了。上述问题的总的轮廓，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中已经天才地指出来了。其中包括：对全国经济的计划管理，个人“地位”的作用以及研究经济利益和物质刺激。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复杂化和协调化（不太需要在不多几个极紧急的方面全力以赴

了），硬性的集中监督和调度管理的办法，已经越来越不切合实际，而从经济上关心个人“地位”对作出经济决定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了。

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前已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它多半是从建立和分析国民经济计划的单一极值模式开始的。这种模式不是从社会方面制定的：它的各种成分是生产技术的“过程”或“部门”，而不是局部的经济主体——具有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个体或集体，这些因素后来才加进模式结构之内。不过，以适当的方法，将局部的自动起作用的技术经济原因和社会经济原因加以区别，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数理经济学派所特有的重要成就，是论证了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价格与估价同计划之间的固有联系。现在，数理经济学派已从考察单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模式转变为分析那些描述实际经济有机结构的模式体系。它所考虑的已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最佳标准，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局部标准。

将国民经济的最佳标准同局部的最佳标准加以协调是注意的中心。在这里，起根本作用的是，计划通过校正经济估计数字来影响地方的经济决定。同时也应知道，国民经济最佳标准本身并不是一种臆断，也不是关于整个社会利益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在调整地方经济的分支系统和团体利益的过程中更加明确起来，它的内容也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发展而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优越性和客观可能性。而利用这一优越性的程度，则取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领导的形式与方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实行科学论证了的经济政策、价格管理和有

计划地组织社会活动，上述的符合就可达到。经济政策包括科学地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与方针，查清社会生产增长的资源与要素，制定经济管理的形式、方法及实施办法。

在实际生活中，对经济过程的理论研究和作出经济决定是交叉进行的，科学地探索和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必要因素。

今天，已经可以预见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相互联系体系的主要理论原理，尽管对其中的各个个别规律的作用与职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基本经济规律（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规律）决定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它也要求目的与手段切合实际，既提出目标，也提出实现目标的手段（现有的或可以创造的手段）。

经济规律体系的下一个基本要素，是提高社会主义生产效率的规律。它意味着必须在社会范围内协调人们的生产活动，按照统一计划发展国民经济，自觉地坚持社会生产发展比例，为社会利益合理地利用全部资源。这些经济政策方面的要求，在国家计划方针上，国民经济管理上和制定计划过程中都要考虑到。价值规律（为物质刺激而加以利用）决定了对经济机构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实现基本经济规律所指明的目标所必需的。价值规律体现在经济政策的各种范畴中（经济核算、价格、资源计划、信贷与财政机构等）。

在制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时，要考虑到已经成为统一体系的社会主义所有经济规律的要求。经济政策不能创造也不能代替经济规律，但是，经济规律只有通过经济政策才能起作用。经济政策适当地具体化为一定的使社会主义经济及其机构完善的目标与办法，以保证全社会的根本利益与全体成员的直接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相结合。正是

在这个方面，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表现得最为具体，现代经济科学的规范职能也表现得最为充分。

社会主义创造了自觉地有计划地最佳发展社会经济的的可能性。现阶段数理经济科学发展的特点，是从研究国民经济在假设（实际上显得不真实的）场合的最优原则转变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职能的结构（借助模式体系）。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职能体系，一方面，是建立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相符合的理论概念（通过系统地考察以及运用经济数学模式来进行）。另一方面，是为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建立有关的“标准”或实际上行得通的经济结构。首先必须把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加以具体化，分门别类地加以计算。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为此，经济科学提出了专题大纲方法。

综合经济纲领今天已成为党的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计划化中的专题大纲方法，还应广泛利用综合国民经济大纲，以便解决全国各部门之间的问题和某些地区性问题（例如西西伯利亚自然资源开发大纲，非黑土带农业发展纲要等）。我们眼前就有科学地论证经济政策的例证：在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理论概念，切实地加以贯彻，然后分析现行经济政策，改变过去作出的决定。

经济最优职能理论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保证社会最优化和地方最优化之间的协调。经济最优职能体系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提出了原则性答案，并且建设性地论述了使总体最优成果同地方最优成果结合起来的政策。

第三节 亚·斯密对经济规律的解释

Г·И·契卡索夫副教授

我们认为，说明亚·斯密在研究单个经济规律及其体系方面的作用，必须从其科学理论的矛盾及两重性出发。

马克思曾这样解释斯密研究方法的特点：“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①马克思还指出了斯密研究方法中内在的方面和外在的方面。由此应当得出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结论：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他那里也有不少肤浅的见解以及对规律的纯粹表面的非科学理解。列宁指出过这一点。^②因此，对斯密在科学地理解经济规律方面的作用，不能作片面地解释，必须既看到他的长处也看到他的弱点。

亚·斯密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论证并正面提出了社会生产发展中的“自然秩序”思想以及社会生产受物质因素制约的思想。因此，他实际上强调了经济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这是创立经济规律科学体系之根本的首要的原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经济过程和范畴，在斯密那里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他在《国富论》序论中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1—182页。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①可以看出，作者总的来说是唯物地理解国民财富这一范畴的（他的体系中最重要范畴）。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长，不是来自某种精神因素，而是来自物质因素——社会劳动。

他对分工性质的解释也是如此。他说：“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②他对货币起源与本质的解释，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对工资性质也发表了类似的有意义的见解：“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③这里所说的分明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他还多次指出过自然工资率，即工资量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其它许多经济范畴，他也强调了类似的客观性质。他特别谈到“商品的自然价格”，“产品的自然分配”，“自然利润率”，“资源的自然分配”等等。

亚·斯密对社会生产发展所持的基本上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他对宗教所抱的极端否定态度而得到了加强。马克思称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④实际上，斯密不仅把神甫列入不生产的居民阶层，而且轻蔑地把他们的职业看作最卑贱的职业之一。

亚·斯密承认社会生产的自然的客观的性质，实际上也就强调了它的规律性以及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恩格斯指出：“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677页。

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①

亚·斯密在经济规律研究上的另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是他深化了分析社会生产的科学抽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确立了许多抽象范畴，使它们更为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②

亚·斯密实际上运用了一般社会劳动这个范畴，而他的前辈（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则只把社会劳动的个别形式看作生产劳动。如果说，重商主义者看到的是商业中的劳动，重农主义者看到的是农业劳动，那末，“相反，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③《国富论》的作者几乎揭示了例如剩余价值那样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马克思强调指出：

“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④指出下述一点也是重要的：他实际上把产业利润看作剩余价值最初的一般的形式。

科学抽象的深化与扩大，使斯密能够看到并研究社会生产的一系列重要联系，这是他的伟大贡献。斯密在发挥劳动价值论时，实际上论证了价值规律。例如，他说：“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2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④ 同上书，第60页。

值。”^①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认识到商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的必然性，他还力图揭示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围绕价值（“自然价格”）的波动而起作用的机制。他说：

“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②他认为，这一波动的基本原因，在于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

亚·斯密试图考察价值规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关系中的作用，马克思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亚·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正是在第一篇的几章（第六、七、八章）中，即在从简单商品交换及其固有的价值规律转到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的那几章中，就感觉到已经出现了缺口；他感觉到，……从结果来看，规律实际上是失效了。”^③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然而，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

亚·斯密几乎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我们在《国富论》中可以读到下面这段精彩论述：“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④他接着又指出，促使资本家着手经营和扩大生产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利润。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66—67页。

④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还应指出，斯密试图证明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根本不同意把资本利润说成是对监督指挥劳动的工资。他坚信，“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①他认为，利润的变动同工资是对立的：“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②

因此，可以说，亚·斯密几乎正确地理解了剩余价值规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③研究了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

亚·斯密在研究其它许多经济规律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富论》，特别是其中前两篇，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经济的一系列重要联系的十分深刻的分析。例如，他在此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的不可避免性。在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时，斯密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愿得不到这种商品，宁愿支付较大的价格。于是竞争便在需求者中间发生。而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价格上升程度的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及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所引起的竞争热烈程度的大小。但在同样富有和同样奢侈的竞争者间，缺乏程度所能引起的竞争程度的大小，却要看这商品对求购者的重要性的 大小。”^④显然，这里不仅谈到了资本主义同竞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竞争的机制、发展及前景。因此，马克思说，斯密提出了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规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8页。

④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1页。

律。这不是偶然的。^①

亚·斯密已经洞察到，市场价格总是取决于商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说：“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②他接着专门考察了绝对需求和实际需求，并举例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斯密已经摸索到了供求规律的作用。

亚·斯密明确认识到地租同土地私有制的必然联系，这是他的大功绩。他说：“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一切其它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③当他把地租称为垄断价格时，他显然感到它同资本主义农业中一定的垄断形式有关。这使他能够接近于揭示出资本主义地租的许多规律。

马克思曾特意指出斯密在解释利润率下降方面的作用：“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亚·斯密说：这是由于资本积累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竞争的加剧。”^④马克思接着指出，这个解释，尽管不无缺点，但总比李嘉图以农产品递减律为主要前提的显然错误的解释好些。

可见，斯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要点。

以上所述，足以证明斯密在经济规律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不应过份评价他在这方面的作用。在他那里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萌芽和经济规律科学体系的某些起点，而且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264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0页。

③ 同上书，第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497页。

多半是不很自觉的直观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①象在其它许多科学问题上一样，斯密在这里也有他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这首先是由于他的方法论基础不坚实。真正科学的经济规律体系只能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才能创立起来。而斯密恰好没有掌握这种方法。我们看到他严重地背离唯物主义而且显然不理解辩证法。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他把人类利己之心看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曾强调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②可见，在斯密对经济规律的解释中，诉诸人类的抽象心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般来说，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们：“把这种（按指资本主义——作者）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③斯密也不例外，总的来说，他也是站在形而上学立场上的。因此，他的社会生产的“自然秩序”是永恒的，永远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在他看来，他所理解的这一制度的本质联系同样是永恒不变的。他对经济规律所持的态度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593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285页。

由此就自然要专注于事情的数量方面。他的兴趣首先不在于社会生产基本过程的质量方面，而是它的数量表现。甚至对于价值、利润、工资和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范畴，他主要也是从数量方面考察的。这就使他不能明确理解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本质区别。

亚·斯密把社会生产规律同人类的生物本性的规律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常常把物品的性质列入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因此，马克思说：“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① 斯密的方法论有这样严重的缺陷，使他不可能为经济规律体系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227页。

第四章 亚·斯密对科学政治经济学 某些范畴研究的贡献

第一节 亚·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和 马克思的评价

M·B·索洛科夫教授

亚·斯密把生产劳动理解为生产资本的劳动。用马克思的话说，斯密给生产劳动下的定义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①的劳动则是非生产的。马克思说：“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征）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②

上述定义，在斯密那里又常常同另一个定义交错在一起，即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的。在他看来，生产劳动一定要固定并物化在可以出售或交换的商品中，而非生产劳动则不是这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② 同上。

在评论斯密的第二种解释时，马克思说：“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来，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观点。”^①

亚·斯密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被科学政治经济学所接受。这个定义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所以，马克思说：“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②

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拥护斯密把生产资本的劳动看作生产劳动的观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庸俗经济学家。他们无视斯密的第一种解释，却抓住他的第二种解释不放。马克思说：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的物质内容，特别是集中在劳动必须固定在一个比较耐久的产品中那个定义，用这个办法为自己的论战制造方便。”^③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未抛弃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个定义。^④那末，马克思究竟怎样评价斯密的这个定义呢？

亚·斯密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售或交换的对象”中。马克思在反驳这一点时，举例说明，非生产劳动同样能够“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售或交换的对象”中。斯密认为，非生产工人的服务“一经提供随即消失”。这也是不对的。

亚·斯密认为，“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补偿开支；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5—166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同上书，第166页。

④ 参阅：同上书，第3分册，第476页。

不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不补偿开支。马克思在评论这一点时，举例说明，商品有时候并不补偿开支，而不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反而补偿开支。为补偿不变资本而购买的商品，会为资本家补偿制成品的价值。但是，资本家为自身消费而购买的商品，并不补偿开支。

对于服务，即“不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资本家为自己的子女雇佣教师，那末，教师的劳动就不补偿对他的开支。如果资本家为其“教育工厂”雇佣教师，那末，教师则以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补偿工资并提供利润。

在评论斯密以物质差别来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时，马克思注意到一种很重要的现象：“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并不总是创造价值的。大家知道，商品世界分为两大部分：物质商品和劳动力商品。“固定”在劳动力商品中的劳动（例如教师与医生的劳动）加入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费用与再生产费用，加入劳动力的价值，但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因此，很明显，医生和教师的劳动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尽管他们的劳动加入一般说来是创造一切价值的那个基金的生产费用，即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①

在市场上经常流通的是这样两类商品：物质商品和劳动力商品。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价值总额等于这两类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此指的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斯密不理解这一点。例如，他说：“即使他（按指工匠——作者）所生产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超过他所消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59—160页。

的价值，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市场上货物实际存在的价值，都赖有他的生产，能比没有他生产的场合大。”^①

马克思反驳说：“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总〕价值，不是由于有‘非生产劳动’而比没有这种劳动时要大吗？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治家等等吗？……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时候都比没有可消费的服务存在时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②这段话常被用来证明，服务具有价值并且创造价值。如果不是孤立地而是同马克思早先的提法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就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了。马克思在此是把服务的价值理解为提供服务的劳动力的价值。^③这个价值是实在的，但它并未增加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和国民收入的价值。

马克思在评论斯密把生产劳动理解为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明。在斯密看来，固定在商品中的劳动应在商品中留下痕迹。马克思在反驳斯密时，举了农业和运输业的例子，指出劳动在这些部门的商品中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但它们加入了商品生产，创造着商品价值。有些经济学家想用马克思对斯密的这些评论，证明商品不一定是物品，商品价值不一定仅仅体现在物品的使用价值中。但是，马克思说：“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象亚·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式去理解。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0—161页。

③ 参阅同上书，第435页。

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指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马克思又说：“虽然如此，商品表现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个说法还是对的，因而，如果它不表现为物的形式，它就只能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形式，但永远不能直接表现为活劳动本身。”^①

不应将商品归结为交换价值。商品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确切些说，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斯密就是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了 this 正确的解释。他说：“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正如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价值形式，归结为产品借以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那种形式即货币一样。在亚·斯密那里，商品的两个条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合并在一起”。^②

总之，第一，认真地读一下马克思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从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的角度，即从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角度评论斯密的。根据这一观点，生产劳动就不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包括那些以独立活动形式出现的劳动，即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提供服务的劳动。生产劳动作为生产资本的劳动，为资本家补偿所支付的工资并带来利润。它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它可以不具有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3—1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6页。

种特点（按指生产商品这一特点——译者）。在这里，如马克思所说，重要的是，“靠资本生活的劳动者和靠收入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①

第二，马克思批评斯密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但他并没有抛弃这一见解。他只是指出，这是一个更基本的观点，没有反映出这一经济范畴的资本主义内容。因此，马克思说：“从一般的简单劳动过程来看，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生产的，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这里适用更具体的定义，即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是生产的。……”②

在生产劳动问题上，马克思批评斯密的主要之点，是他的不彻底性。由于这种不彻底性，斯密不仅把生产劳动下定义为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而且下定义为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③在斯密的概念中，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总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即总是生产的。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是否成为生产的，取决于是否生产物质财富。这两种解释在他那里常常交错在一起。

从马克思对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的分析批判，可以看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态度还体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理论的分析中，体现在对批判斯密理论的经济学家著作的批判研究中。有必要强调指出，在把生产劳动解释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维护斯密，反对庸俗经济学对他的攻击的。例如，在反驳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476页。

② 同上书，第46卷，俄文版，第93—94页。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7），1933年俄文版，第127页。

尔涅时，马克思说：“第一，亚·斯密并不否认非生产劳动者会生产某种产品。否则，他根本就不是劳动者了。第二，开药方的医生不是生产劳动者，而配药的药剂师却是生产劳动者，这看起来好象是奇怪的。同样，制造提琴的乐器制造者是生产劳动者，而演奏提琴的提琴师却不是”。①

在批判斯密和庸俗经济学家时，马克思发挥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的科学原理。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角度区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用第一种方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用第二种方法则有助于把物质生产同其它形式的活动区别开来。这两种方法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都是存在的。

创造国民收入的劳动是收入的源泉。于是，收入就可分为第一级的和第二级的。创造国民收入的各物质生产要素获得第一级收入；非生产领域工作者通过物质生产劳动者收入的再分配获得第二级收入。收入也可分为基本的和派生的。这样划分的意义在于，把得自某一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收入同得自这一制度体系之外的收入区分开来。派生收入的源泉是基本收入，即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派生收入是从基本收入中扣除下来的。在解释由对服务的报酬引起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种关系并不包含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②换言之，酬谢服务所引起的关系并不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对服务支付报酬完全是一种再分配关系，它同占统治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0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435页。

位的生产关系体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再分配关系便不能存在，因为它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关系体系。这些再分配关系（购买服务）应被视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资本家和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关系，而是消费剩余价值和物质资料的关系。

基本收入如果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得到的，就是第一级收入；如果是在非物质生产领域通过再分配重新创造的价值而得到的，就是第二级收入。但是，无论何时，基本收入总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中得到的。

然而在经济学文献中，常把基本收入仅仅同物质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理解，非生产领域工作者的收入始终是派生的收入。斯密的一条有名的原理助长了这种看法。依据这条原理，与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基本收入不同，非生产领域工作者的收入是派生的。结果，非生产领域经济关系的特点，就只是再分配的关系，即不反映某个生产方式的本质。但是，这种关系只是在交纳税收和支付服务（厨师、裁缝等）时才引起的。

亚·斯密的这个原理曾被马克思援引过，而且常常被人看作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马克思在批判斯密教条时，引述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任何其它一种收入，最终地都是从其中某一个派生出来的。”^①

接着，马克思在小结关于斯密教条的论述时，又提到了斯密对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的理解。他说：“一切不直接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2页。

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即不在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的人，或者不劳动的人，首先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和那些原始的收入相对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的派生的收入的承受人，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等的社会职能来取得这种收入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作是他们的收入的原始源泉。”^①

可见，斯密说的是，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全部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而马克思转述这一原理时，谈的是不参加再生产或者一般不劳动的社会成员的收入，来自工资（生产工人的）、利润和地租。如果不考虑非生产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非生产领域的所有工作者的收入都是派生的。斯密尽管把生产劳动下定义为直接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但他不承认非生产领域工作者的劳动是生产的。

马克思批判了斯密的不彻底性。他指出，演员教师——雇佣劳动者的服务，“会自行更新用以支付它们的基金”。^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他们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派生的，即不是来自基本的收入或生产要素的收入。马克思同意斯密的下述见解：非生产领域工作者同收入的原始源泉无关，他们的劳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因此他们的收入来自物质生产劳动者的收入。不过，马克思在原则上是把从属于资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2—4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158页。

劳动者的收入和不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者的收入区分开来的。

让我们回到那个成为现今几种收入理论解释之基础的原理。人们很容易相信，把收入划分为原始的和派生的这个原理不是马克思作出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我们看到，这里提出的问题（补偿不变资本问题——作者）已经在第二卷第三篇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解决了。我们在这里反过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在那里剩余价值还没有在它的收入形式上即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形式上加以阐明，因而还不能在这些形式上加以研究，……”。^①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未把收入分为原始的和派生的，因为他还未分析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

苏联经济学家阿卡巴扬和麦德维杰夫注意到我们所研究的有关收入划分的原理，也注意到《资本论》1949年版和1961年版译文上的区别。在1949年版中，有关的一句话是这样开头的：“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②1961年版是这样译的：“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即不在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的人，或者不劳动的人……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③两种译文显然有重要的差别。对马克思来说，参加再生产，并不意味着只在物质生产领域工作。1961年版的译文，更接近斯密（而不是马克思）对问题的理解。但这并不能作为阿卡巴扬和麦德维杰夫所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5—94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莫斯科，1949年，第二卷，第3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俄文版，第418页。（参阅中文版，第412—413页）

结论的理由。按他们的说法，非生产领域劳动者创造价值和国民收入。但问题不在于译文，而在于有些研究者接受了斯密关于原始（基本）收入和派生收入的划分。

这样解释基本收入和派生收入是很普遍的。非生产领域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的收入通常被看作派生的。因此，作为一种劳动的社会经济形式但却是非生产劳动形式的服务，在教科书中不予分析。劳动的这一经济形式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有关。分析这一劳动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要不要把服务作为劳动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式列入社会经济基础，列入生产关系体系。

除了服务不表现某种生产方式以外，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它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

※ ※ ※ ※

苏联的经济学文献对生产关系的解释是加了限制的，认为生产关系是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派生的（第二级）收入的形成有赖于基本的（第一级）收入，后者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组成。非生产领域工作者的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属于派生的（第二级）收入。对非生产领域劳动者服务的酬金，是派生收入的主要源泉之一。例如，律师或医生的酬金就是来自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或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这要看谁利用了他们的服务，并付给他们报酬。”^①

教科书把基本收入等同于第一级收入，但它们并不是一

^①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鲁缅采夫主编，莫斯科，1973年，第352页。

回事。商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收入可以是基本的，但却不是第一级的。第一级收入只是在以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领域中获得的收入。通过第一级收入的再分配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是第二级的或派生的收入。非生产领域劳动者的收入总是作为第二级的收入出现的，它们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形成的。

不能同意教科书作者的下述说法，即律师或医生的酬金得自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因为这种情形所涉及的只是对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之外（即不从属于资本）的律师和医生的酬金，这种酬金只是对服务的酬劳。当律师或医生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家工作时，他们获得的是工资，而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得到利润。这里涉及的就不是对服务的酬劳。律师、医生和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的收入都是基本的收入，而不是派生的收入。基本收入是某个生产方式的基本阶级的收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基本收入就是物质生产和非生产领域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利润（确切些说，是工商业职能资本家的收入），货币资本家的利息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教科书作者把一切非生产领域工作者的收入都称为派生收入，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可以举商业资本家和商业雇佣工人为例。商业资本家的利润以及被雇佣的商业工人的工资的源泉是剩余价值，商业资本从事的是非生产领域。但是，商业资本家及其所雇佣的工人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因而他们的收入是基本收入。不能说非生产领域劳动者收入的源泉是服务的报酬。服务的报酬，只是在非生产领域劳动者不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我们的例证中，就是资本主义关系）时才存在。

第二节 亚·斯密《国富论》中的 资本积累问题

П. А. 马林舍夫博士

亚·斯密《国富论》中的许多原理，是马列主义创始人所制定的真正科学的积累理论的重要来源。《国富论》第二篇就是专讲资本积累问题的。

亚·斯密的一个功绩，是论证了积累的客观界限。他把积累下定义为生产超过目前消费。他指出：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①斯密规定了积累的客观物质界限，但并没有揭示资本积累特有的本质，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或积累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尽管如此，马列主义创始人还是强调了斯密和李嘉图把积累下定义为生产超过目前消费（生产的消费与使用消费）的科学意义。

亚·斯密的另一个功绩，是论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形式的资财。在他看来，资财不是别的，而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积累的某种形式。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斯密首次论证的。他把社会资财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同时又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4页。

十分详细地列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质构成部分。

尽管斯密把全部社会财富分为三部分，但他断定，在流动资本中，作为消费的那部分资本，也就是社会财富各部分中用作消费的资财。他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是其全体居民的资财，所以，亦自然分作这三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食品、衣服、家俱等物，属于这一类。仅供居住的国内房屋，也是这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至于流动资本，其中的一部分是“屠户、牧畜家、农业家、谷商、酿酒商人等人所有的食品。”^① 斯密在这里直接指出了积累起来用作消费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其中包括目前消费的资料和作为耐久消费而积累的房屋。

亚·斯密十分严格地遵循着这个定义：积累是生产超过目前的消费，而资财则是积累的形式。尽管正被消费的食品、衣服等等，就其物质形式而言，同列入资财之内但尚未消费的消费资料没有什么差别，但后者计入积累基金，因为它以资财的形式出现，它在这时候是生产超过目前消费的余额。

把社会财富的生产基金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部类，把全部社会财富分为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同把年积累基金分为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一样，在方法论、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巨大意义。于是对“斯密教条”产生了问题。

从亚·斯密开始，直到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到“斯密教条”的束缚，只承认消费品的积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摆脱了这种片面性。列宁在批评斯密的观点时，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6，258页。

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为亚·斯密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这个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①积累过程在社会再生产的两个部类中都存在，而且互相发生作用。因此，承认社会财富分为两种基金，但又否认年积累基金中的生产品积累和消费品积累之间比例的客观性，是自相矛盾的。列宁援引马克思对斯密的评论是很有教益的。大家知道，斯密从产品中排除了资本，但在社会总收入中又把它包括了进来。列宁指出：“马克思就抓住了亚·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不把资本包括在产品中，又怎么能把资本包括在收入中呢？”^②

亚·斯密论证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同积累之间的关系，指出生产劳动是积累的最重要因素，这是他的重要功绩之一。《国富论》第二篇第二章的标题，就是“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他指出，“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③他又说：“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④尽管斯密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但他相当详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9页。马克思指出：“李嘉图（从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任何积累都可归结为工资的支出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418页。）

③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03页。

④ 同上书，第315页。

细地指出了机器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资本积累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头等重要的因素。他对资本作为积累劳动在保障提高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有很好的理解。在斯密时代，手工技艺占优势，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机械技术形式的固定资本尚未渗入生产过程内部，因此，斯密强调的是劳动生产力同积累（保障生产力的进步）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采用了斯密所使用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劳动生产力、运用中的资本和追加资本等概念，并赋予它们以实际的科学的社会经济内容。除此以外，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就显得有局限性了。不过，它还是马克思创立真正科学的生产劳动学说的源泉之一。例如，现在人们只把生产与消费的物质储备，理解为资源形式上的积累，而不把服务考虑在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多亏了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

亚·斯密关于正在使用中的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学说也有迫切意义。他谈到机器和工具在减轻和节省活劳动耗费方面的作用时，没有揭示它的社会形式，也没有揭示活劳动与积累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对抗性。马列主义创始人作出了这些分析。例如，《共产党宣言》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①

由于资本主义尚不发展，它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作用尚未展开，使斯密不可能论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两个部类发展的规律，论证资本积累过程在两个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481页。

类中的相互作用。不过，他把社会财富一般地规定为积累的劳动和增进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仍然具有科学意义。

第三节 亚·斯密关于国际分工的思想与现时代

Р·И·卡留尼科夫通讯院士

А·Г·米列科夫斯基通讯院士

亚·斯密关于国际分工对各国命运的巨大影响的见解，是他的全部科学遗产中最为人们知晓而且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在《国富论》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①

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源泉，这是贯穿《国富论》全书的思想。即使在分工并不明显出现的各篇中，也能感觉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斯密考察了分工对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从单个工场到世界经济）的作用。他研究了单个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也研究了社会的分工，其中包括部门之间，城乡（工农业）之间，工业与商业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他把科学划分为一种独立活动方式）之间，一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以及各国经济之间的分工。斯密认为，低级阶段的分工，在高级阶段会完全准确地或几乎完全准确地重现出来，因此，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可以作为一种“模式”，依照它来建立各行业之间、各生产领域之间、以及整个经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页注。

分工。

但在考察各部门的分工时，斯密指的不是手工工场，而是简单再生产。这两种情形下的分工，虽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如马克思所说，它们之间有原则的区别。在手工工场内部，工人之间的分工不以交换为媒介，具有自觉的性质，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所有这些，都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分工。

亚·斯密认为，分工的主要后果，是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是由于，第一，分工提高了工人的技巧，使他专注于某一产品或工序。第二，分工节约了时间，不必在转换工种上花时间。第三，分工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分工的程度表现了各部门产业发展的水平。在斯密看来，分工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

在高度评价分工的同时，斯密也指出了分工的阴暗面。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那末，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①

在斯密看来，各国之间的分工，是各种分工形式中的最高阶段。它是斯密维护对外贸易自由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外贸可使“国内市场的狭隘性并不妨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②“自由放任”这个口号就是直接从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这一有名论断中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38—339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得出来的。打破市场限制，可以推动分工的深化。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关系正好相反：市场的大小取决于分工的程度。

然而，斯密正是借助于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论题，论证了发展分工，就必须取消国内外贸易中的壁垒。这是否意味着，他为企业和贸易自由所进行的斗争是建立在错误原理的基础上呢？不是的。因为，消除各地区和各国之间经济关系中的障碍，同样意味着增加工人人数和资本数额，以便实现分工。如果各国过去的分工受到各自国家的劳动和资本规模的限制，那末，现在它则受到这些国家总资本规模和全部工人人数的限制。因此便出现了进一步加深分工的可能性。斯密指出，分工不仅取决于市场规模，而且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规模。他在谈到市场受工人人数限制时指出：“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够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他以类似方式谈到了资本：“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①

可见，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限制的思想本身是错误的，但是，在市场、劳动和资本各有多大规模才能彼此符合的意义上，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分析对外贸易时，引用分工由市场限制的原理是正确的，因为国际交流的扩大就等于资本和工人的增加，等于分工程度的扩大。

人们通常以过剩产品范畴来分析各国间的分工。斯密所谓的过剩产品，指的是超过某人消费的产品（如果说的是个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2，253页。

人生产)或超过该国消费的产品(如果说的是全国经济)。市场的扩大创造着对过剩产品的需求。这些过剩产品的出现鼓励“他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他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①

一国资本家起初把资本投到他们比别国资本家占优势的部门,而避开别人占优势的部门(因此,斯密强调说,这种优势是天然的还是后来才获得的,无关紧要)。其它国家的资本家同样如此。

各国经济在生产其它国家所需要的商品上的专业化,使它们同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各国越来越彼此信赖,互相需要。国际分工提高了世界生产的效率,因为各国在那些生产可能性更高的部门都实行了专业化。这便加深了分工,其利益全分摊到各国的经济之中。

国际分工的发展不仅是商品交易的结果。如果一国资本不足,为了保障经济发展,就要适当地从别国吸收资本。此外,斯密还建议,彼此通报关于各种产业活动的知识,它自然会导致各国之间关系的活跃。斯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比交换学说的拥护者们深刻,后者仅把商品交换视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斯密还以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为例,令人信服地证明,各国之间的经济交织到了何种程度。同重商主义者相反,他赞成殖民地发展产业。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它们的经济与政治独立。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迅速发展,使斯密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域内解释自由贸易。

亚·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了一幅各国经济紧密交织的图景。任何两国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它各国的发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9页。

展。例如，英国和美洲经济关系的加深就产生了连锁反应——阻滞了所有欧洲国家之间分工的发展，甚至阻滞了和美洲与英国皆无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分工的发展。斯密指出了“连锁反应”的后果，是他对自然的国际分工所作的最深刻的考察之一。

亚·斯密的下述见解也是重要的：对自由贸易（从而对分工）的限制，往往是军事政治方面的意图所强加的，目的在于不使邻国富强。但是，他指出，这在经济关系方面总是不利的：“在战争或政治上，邻国的财富，虽对我国有危险，但在贸易上，则确对我国有利益。”^①在他看来，各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是发展国际分工的最好条件。

亚·斯密关于国际分工的思想的命运是复杂而矛盾的。作为斯密理论的继承者，李嘉图发展了迄今仍有效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斯密的思想补充了全新的东西。马列主义创始人对斯密的评价很高，不仅把他看作一位理论家，而且看作一位进步的（对当时来说）国内外经济政策措施方面的宣传家。

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从斯密那里主要吸取了自由贸易口号。但他们总是把某些暂时的主张和对单方面有利的意图，强加在这个口号上，而对建立有利于参加各方的国际经济关系却不感兴趣。

国际分工原则的变革，是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消灭了沙皇的殖民体系，实际上实现了斯密的要求，取消了他所谓的“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他认为这种垄断贸易延缓了殖民地的“制造业和生产的发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6页。

展”，从而使宗主国占优势）。①十月革命第一次向世界显示了不妨碍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以平等、合作和互利为基础的分工体系。

当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时，在同样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这里，分工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广阔余地。资本主义国家在分工方面的政策决定于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而不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利益，但社会主义国家却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寻求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建立在社会主义分工基础上的各项原则，越来越普及并逐步得到了实现。

亚·斯密的思想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它在世界经济领域正愈益坚定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

亚·斯密是推翻了封建主义的进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谈的是国民致富的原因。现在，两方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写了一本关于国民贫困的根源的书，书名是《亚洲的悲剧（国民贫困之研究）》，以示继续斯密的研究。《国富论》的作者坚信，“自然规律”的作用，即经济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特别是以这些规律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会导致国民的富裕。英国移民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思想家们接受了斯密的思想，并使之付诸实践。所有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往昔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实现了丰裕（按资产阶级对这一概念的解释）。这些国家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了自己过去的宗主国，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起初用老办法，现在则用更精明的新殖民主义手法，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不断增加自己的

① 参阅：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51—153页。

财富。

自由竞争在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导致了宗主国的统治。在这些宗主国中，拥有广阔殖民地的英国名列第一。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力争垄断地占有领土即殖民地垄断，成为加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最重要源泉之一。它的牺牲品，就是亚洲人民的贫困，陷入缪尔达尔所描绘的悲剧。和斯密不同，缪尔达尔在研究亚洲人民贫困的原因时，没有指望客观经济规律会起到克服贫困的作用。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制度学派代表者，缪尔达尔相信，把人道主义思想灌输到西方有权势阶层的意识中，就会使他们更慷慨地援助饥饿的亚洲，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便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得到改造。

然而，在现代，当世界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时，在国际分工领域，有助于消灭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客观经济规律已经在起作用了。它表现在两个对立体系的矛盾中，这一矛盾导致了帝国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瓦解。正是由于两个体系的竞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才使发展中国家的封建结构（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得以崩溃。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由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且由于自下而上的广泛群众性革命运动。这一革命运动只能从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支持和帮助。

国际分工的新的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

在共产主义制度形成的时代，在帝国主义统治地盘缩小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新的世界性的分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斯密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途径的伟大科学研究有了新的意义，成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科学财产。

第四节 亚·斯密经济理论中的货币

A·A·汉德鲁也夫副博士

亚·斯密把货币的出现同分工以及社会变为“商业联盟”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交换当事人在彼此交换时遇到了不便。不过，斯密并没有把交换中由于没有货币而带来的技术上的困难作为解释货币起源的出发点。相反，他是从分工程度所决定的交换发展条件中引出这些困难的。他说：“自分工确立以来，各时代各社会中，有思虑的人，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①可见，交换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货币的出现。《国富论》关于货币起源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成果。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献中，也把货币的产生同必须克服物物交换（直接交换）中技术性限制的困难联系在一起。例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它是‘流通手段或购买力的暂时储存器’）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避免物物交换当事者需求的‘巧合’”。^②他们过份强调伴随物物交换而出现的商业交易中的高额费用（运费），忽视要求出现一般等价物的经济条件的特点，把货币归结为一种简单的技术手段。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0页。

② 弗里德曼：《货币最佳数量》，伦敦，1967年，第3页。

亚·斯密对货币形态发展的解释，尽管有许多合理的地方，然而他毕竟停留在表面的演进上。马克思指出：“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① 斯密没有看到，价值的货币形式的发展，同商品的矛盾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不能克服上述困难。他常常偏重于对历史上相互交替的各种货币形式加以描绘和分类。他记载了曾经用各种不同的商品作为货币这一事实，记载了为此目的而使用的各种适宜金属的优点。金属币被纸币所代替的历史例证，使斯密有理由断定，纸币在一定的限制下可以顺利履行货币职能。描述货币流通领域的事实，不会引起对决定了结算形式变换的前提条件的理论考察。斯密描述不同类型的货币制度，并不是为了揭示价值的货币形式演进的内在动因。

亚·斯密的进化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历史的理由。在写作《国富论》的年代，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完全受不同的规律支配”^②）还处在形成时期。只消指出下述事实就够了：英国证券交易所是在斯密著作问世前一年才创建的。证券交易制度的最高形式尚不发达，还没能在金属货币制度的内在趋势上打下烙印，这就决定了金属货币制度的历史地位。

亚·斯密作为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始终坚持着货币的商品性质的论点。在他把货币看作“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见拒绝”的商品时，在他分析纸币时，斯密实际上发展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即纸币价值取决于它们在货币流通渠道中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97页。

然而，对货币本质理解的这些科学因素，在斯密那里，是同另一些错误原理交错在一起的。他错误地把货币当作一种简单的商品。他由于没有揭示出商品的内在性质，因而不能确定货币在商品生产各范畴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他正确记录了货币起源于商品，但没有看出货币的两重性。斯密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即当商品作为货币职能的体现者变成一种自发的起社会作用的工具时，就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了。他把货币概念同货币的职能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指出：“在《国富论》中找不到‘currency’和‘money’，即流通手段和货币之间的区别。”^①

亚·斯密过于简单地理解货币的经济内容，为否认货币的商品性质打下了基础，大家知道，货币在其流通手段职能上，是为商品运动服务的暂时的手段。因此，对实现这一职能来说，制造货币的任何金属在原则上都没有区别。纸币也同足值的硬币一样，可以很好地为商品流通服务。把货币概念等同于流通手段职能，客观上会导致类似名目论的结论。斯密没有作出这种结论，然而从他的学说本应得出这种结论。最著名的名目论代表者之一边迪森指出：“谁想在货币的纯粹形式上了解它的本质，就应坚信，纸币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要知道，货币并不具有使我们喜悦或因它而致富的目的，它不过是获得所遇到的服务的一种手段。”^②

由此可见，对货币的商品性质的简单化的理解，为名目论打下了基础。何况在斯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已经有了名目论的成分。这是指他想要找出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158页。

^② Φ·边迪森：《货币》，彼得格勒，1923年，第37页。

他明白，“象一切其它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时有高低，其购买也时有难易”。^①他认为，贵金属不能作为价值的十分精确的尺度，因为它本身内在的价值会有变动。但他又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这同货币的商品性质的论题是抵触的。

价值尺度由观念的货币来履行，这种情况掩盖了观念的货币单位同社会所承认的局部的个别的生产者的劳动耗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里又显示出斯密对货币的两重性估计不足的消极后果。象其它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斯密也没有看到，“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②企图找出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找出一种理想的人为的计算单位，是基于对商品经济本质特点之不科学的抽象。而在商品经济中，社会所承认的劳动耗费，必须具有一定的物的形式。

亚·斯密的声望对后来货币研究的课题发生了很大影响。“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直到19世纪上半期，都是主要课题之一。不过，如果说，斯密追求“不变的”价值尺度，反映了价值定义的发展，而且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分析的前提，那末，后来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则被用来攻击劳动价值论，特别是攻击关于货币的商品性质的观点。认为货币充其量反映价值，但不改变价值，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分析中的“老生常谈”之一。费特说：“货币单位反映和比较着价值、生产费用和价格。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反映价值的工具，……价值计量单位可以表现和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116页。

比较价值，但并不能改变价值。”^①由此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是一种约定的东西。

亚·斯密在货币分析上的缺点，多半同他对货币的商品性质这一原理的形而上学解释有关。当他把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所有货币形式，都企图直接置于流通的金属本位之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他那里还有对重金主义的某种信仰。《国富论》把纸币同信用货币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斯密对李嘉图犯有类似错误的理论立场的形成，无疑发生了影响。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不时地援引斯密来阐述自己在货币流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观点。对货币概念所持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是混淆货币形式（如上所述）的基础。

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关于货币的商品性质的论点，并没有导致在个别商品的背后去断定货币的性质。他指出了交换条件的改变同货币的经济内容之间的相互依存。在商品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价值的货币形式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它在货币职能的特点上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②这一原理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这种方法使马克思可以天才地预见到，代替金属货币制度的，将是一种崭新的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制度。

前已指出，说斯密好象实际上排除了对货币的理论分析是没有根据的。但他把货币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从属地位，大概不能否认。《国富论》就有直接表明这一点的说

^① O·费特：《实用货币理论》，杜平根，1966年，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32—133页。

法。他说：“流通国内的金币银币，可与通衢大道相比。通衢大道，能使稻麦流转运到国内各市场，但它本身却不产稻麦。”^①

亚·斯密正确指出了货币本身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但他不理解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他集中注意于再生产的物质方面，却没有揭示出货币流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规律性。货币向货币资本（构成产业资本的独立职能形式）的转化，实际上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运动，在斯密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反映。

马克思说，重商主义“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②而斯密却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营目的与动力的明确概念。他把货币过于简单地解释成为使用价值的运动服务的单纯工具，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轻视（不是忽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因素，同斯密学说最初的原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把货币看作是“看不见的手”借以支配经济秩序的要素之一。只是当社会受到货币过剩或不足之苦时，即“自然秩序”遭到破坏时，货币才出现在经济生活的前台。只要货币流通在正常地运转，存在于经济关系体系中的货币就不会引人注目。

强调货币的媒介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写作《国富论》这部有重大价值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得到解释。在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它同货币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有关）形式上的可能性，还未转化为现实性。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的人，自然不了解周期性工业、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149页。

商业和货币信用危机。因此，富有远见的斯密，也未能从货币上看出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因素。此外，《国富论》是在同重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极为强调货币在资产阶级经济中的作用）进行尖锐争论的背景下写作的，这个情况对于说明斯密的货币作用的理论也是相当重要的。

第五节 资本主义信贷及其发展在 亚·斯密著作中的反映

B·T·穆沙托夫副博士

《国富论》第二篇是阐述资本问题的。其中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资本借贷。当斯密指出“贷出取息的资财，出租人总是看作资本”^①时，他所注意的正是资本主义信贷。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斯密反对为直接消费的借贷，他认为这对借贷双方都没有好处。按他的意见，借来的资金应当用作资本，而借用者应当大多数是职能资本家。

在研究借贷资本时，斯密注意得较多的问题，是利息（借贷资本的报酬）的性质和变动。利息表面上是一定数额货币资本本身的产物，它掩盖了利息的真正来源。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取得了它的最彻底的物的形式，它的纯粹的拜物教形式，剩余价值的性质表现为一种完全丧失了它自身的东西。”^②斯密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利息的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54页。

派生性质并把它看作利润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与庸俗经济学家相反，斯密“不止一次地明白指出，利息由于一般说来代表剩余价值，始终只是从利润中派生的形式。”^① 斯密理解利息率形成的客观性，也理解对利息率的影响是有限度的。斯密接触这一问题同下述情况有关：在17—18世纪，地位不断巩固的资产阶级曾利用国家进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后者阻碍着资本主义关系在信贷领域中的形成。当时实行由国家规定最高利息率的办法。斯密冷静地估计到国家调节的界限。他指出，“没有任何法律，能把利息减低到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之下。”^②

亚·斯密认识到市场借贷利息率的客观性，但他不能科学地说明决定利息水平形成规律的各种因素之综合。他没有看出资本主义信贷与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下述特点有关：资本循环过程会导致它的一部分资本暂时游离，出现在货币市场上并成为借贷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斯密不理解资本主义信贷发展的客观基础，所以不能科学地理解信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亚·斯密指出了利息率下降的倾向，并认为这种趋向将继续下去。他对这一现象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的：借贷资本额的增加和利润率的下跌。

亚·斯密正确地指出了影响上述倾向的因素，但他对这些因素及其出现的原因的解释却是错误的。

亚·斯密没有直接谈到资本主义信贷的两种形式（银行的与商业的）。不过，可以断定，他对商业信贷的局限性是了解的。他指出，这是因为借贷资本大部分以货币为工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60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28页。

应当说，在说明货币在借贷资本运动机制中的作用方面，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9章曾从《国富论》中引了很长一段话。斯密在这段话中指出，借贷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①

马克思对这一现象赋予很大意义。因为它显露了资本主义信贷的特点，即借贷资本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这种虚拟性在最复杂的信贷体系中得到了充分发展。斯密不理解这一现象随着银行（主要的信贷机关）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马克思阐述货币作为信贷资本媒介的同时，把研究继续推向前进，提高到一个新的分析水平：“亚·斯密关于一般借贷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存款。”^②今天，借贷资本具有一定虚拟性的特点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马克思对此早已作过说明：“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③

亚·斯密接近于理解资本主义信贷的虚拟性，但他在逻辑上没有把自己的研究贯彻到底。因此，他便不能理解从资本主义信贷发展中产生出来的虚拟资本这个重要范畴的意义。

应当说，斯密看到了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信贷领域所产生的虚拟性的一些因素。他知道，开期票并不就是实际的交易，这样作只是为了银行结算。获得银行信贷实际上也用类似方法，因此这里所用的期票，在斯密看来就有虚拟性。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534页。

② 同上书，第535页。

③ 同上书，第535页。

承认，银行由于不认识客户，有时难以分辨期票的真假。

亚·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虚拟资本的各种形式（有价证券）。他对当时“各种借债方法”的技术性细节很注意。在这里他也论述了国债。他实际上指出了虚拟资本市场的形成，因为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国家有价证券。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股份形式的转变，是在19世纪下半期发展起来的。它的前提之一，就是虚拟资本市场机构要靠国债来“运转”，而且这一机构能够在技术上保证流通的有价证券的数量可以突然增长。斯密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有价证券市场形成过程的见证人，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了这一过程。

亚·斯密只是描述和记录了同虚拟资本有关的现象，没有看到基于这些现象的经济关系的实质。斯密为什么没有认识到存在着虚拟资本这个重要的独立的范畴？其中的缘故应当说在于更一般的问题上，即他对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的看法是很狭隘的。

马克思把借贷资本看作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部分。他揭示了资本主义信贷的实质，指出了它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他指出：“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创造的一种形式。”^①产业资本通过建立完全合乎自己要求的信用制度，支配着生息资本。因此，“信用制度是它（按指产业资本）自己的创造，信用制度本身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开始于工场手工业，随着大工业而进一步发展起来。”^②

亚·斯密没有研究信用制度形成的规律与产业资本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576页。

② 同上书，第519页。

的有机联系。他脱离对生息资本的分析去考察信贷制度。他对银行活动的解释，是在借贷资本之前，联系到货币在流通机构中的职能来进行的。斯密首先感兴趣的，是信用货币的起源与作用，而银行在他那里实际上处于次要的为信用货币流通服务的地位。斯密高度评价了信用货币的作用：加速资本流通，节约了同流通中使用足值金属币有关的费用。然而信用货币在他那里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并且掩盖了信用的其它方面。因此，他便把银行在信贷领域的活动实际上局限于同期票结算有关的业务。在斯密看来，在资本周转过程中，显然必须有一部分资本总是处在货币形式上，以保证这一过程不致中断。假如资本家不必支配为应付眼前支付所需要的全部货币资本，资本周转就可加快。在斯密看来，这正是银行的中心职能。他说：“商人或企业家营业的资本，既不宜全部向银行借贷，亦不宜大部向银行借贷。商人或企业家固然可以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不时的需要，省得储下现钱留着不用，但他的资本，亦只有这个部分，宜向银行借贷。”^①

可见，斯密的立场同那些认为信贷是“现实的炼金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格格不入的。为了理解斯密观点的由来，有必要了解一下18世纪中叶的银行制度。当时的银行主要是为转帐服务的。14—16世纪意大利的私人银行和后来的公立银行就是这样。它们最主要的活动是结算。例外情况下的贷款被视为一项灵活的业务，而且这些款项预定不能作为资本之用。银行不能拒绝领主和国王等人的信贷要求。不过，借贷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职能，认为它妨碍银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79页。

行履行它的主要职能——结算。成立于1609年，存在了大约200年之久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最大的转帐银行。斯密对它作了详细论述。他确信，这个银行从不利用存款人的资本从事自己的业务，就象该银行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比较切合实际的劳氏则认为相反的作法是正确的。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一点：资本主义欧洲当时最大的银行是转帐银行。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类银行的作用完全可以简化和缩减到只起辅助作用。

亚·斯密意识到这类当时很流行的银行的局限性。因此，他在研究了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的第二篇之外，在批判分析重商主义体系时，只是作为说明外贸业务的细节之一，才论述了阿姆斯特丹银行。马克思指出，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同1619年建立的汉堡银行一样，并不是现代信用事业发展中新时代的标志。

当时，资本主义企业家不仅要求银行进行简化贸易业务的结算，而且要求它成为加速资本周转的信贷者和杠杆。正因为如此，斯密才特别注意英格兰银行与苏格兰银行，因为它们发展的道路与别国银行不同。它们最早发行银行流通券，发行规模在当时也是最大的。它们还开办了现金结算业务。进行现金结算是苏格兰银行的特点，它是在斯密动手写作《国富论》前不久才开始这项业务的。因此，应当说，把这项业务从其它许多业务中专门划分出来，并且正确地评价了它的意义，这是斯密的功绩。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斯密看来，银行的基本活动不是早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转帐，而是通过期票结算向职能资本家提供信贷和开办现金结算。

《国富论》出版那一年，英国约有150家银行。此后，

银行数目急剧增加。1790年已有350家。18世纪下半期的银行拥有的资源相对来说并不多。现代的读者看到斯密说银行比私人更难于判明债务人的支付能力会觉得奇怪，其实，它十分恰当地表明了这类银行的实际状况。很显然，当时银行的要求是很低的。首先，私人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超出了银行能力的信贷扩张。斯密论述了几个造成严重后果的破产例证。他由此便作出了银行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应是有限的结论。既然当时的银行在试图向职能资本家拨款时遭到了打击，而银行的破产又引起了整个结构的混乱，所以斯密便得出结论：银行只应履行很有限的任务。

亚·斯密正确地指出了使当时的银行不能广泛开展信贷业务的弱点，但他没有指出银行职能发展的前景。

古典派的信用论多半是由李嘉图阐明的。他有一段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不认为，信贷那怕在最低限度上能够促进产品生产……信贷只能支配那些将资本家推动起来的人。资本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①

然而，斯密的立场同李嘉图很不相同。从斯密对银行作用所作的下述总结性评价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李嘉图走得那么远。他说：“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②

总之，亚·斯密在信贷问题上，充分而详尽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信贷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他不仅对当时的主要信贷

① 转引自：З·卡涅巴乌：《货币信用学说》，1928年，莫斯科，第229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94—295页。

业务作了有价值的论述，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理。但他没有对信贷作出总结性分析。这是因为，第一，他没有揭示信贷资本产生的客观基础。第二，他没有追溯资本主义信贷从借贷行为到最复杂的信贷体系的发展和以此为职能的银行的形成。只有马克思才创立了真正科学的资本主义信用理论。

第六节 《国富论》中的地租理论

〔东德〕 F·赫尔教授

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地租理论时，曾经依据威·配第、亚·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他批判地吸取和利用了其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地租理论。

有人认为，在地租问题上，马克思首先发展了李嘉图的观点。这是不对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也包含着斯密在研究地租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亚·斯密对地租问题是很注意的。他考察了地租的性质、来源、表现形式以及地租进一步发展的问題。

亚·斯密是从配第的观点出发的，并且在配第之后一百年，比这位“政治经济学之父”大大前进了一步。在配第到斯密之间，在地租理论方面，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不过，斯密研究方法的两重性也影响到他的地租论，使其成为矛盾的理论。

亚·斯密总是把地租同投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上的资本联系起来加以解释，马克思认为这是斯密的大功绩。这一点迄今仍是有意义的。

亚·斯密基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把生产劳动（确切地说，剩余劳动）看作租金的源泉。他指出，租佃人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交给地主，以便获准使用土地。

同时，象马克思所说，斯密又总是措着“重农主义包袱”。斯密说，一定量生产劳动在农业上会比在手工工场中提供更多的产品。由此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租金是自然界的恩赐。

亚·斯密关于租金形式的结论是有意义的。他把租金视为使用土地的代价。在更准确地解释这一概念时，他将它分为租金和租佃的报酬。他把后者看作最重要的租金形式。

亚·斯密把地租分为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也是他的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原理牵涉到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关租金变动的争论。在我们看来，在现代条件下，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货币形式的租金上涨了，而实物形式的租金下降了。

亚·斯密把租金和地租等量齐观。他不了解绝对地租，但有时又感到它的存在。他把租金按照来自土地位置或是来自土地肥沃程度划分开来。矿山地租也被列入租金。斯密不能全面解释级差地租的本质，因为他总是把租金错误地同土地的绝对肥沃程度联系在一起。安德森在《国富论》问世一年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正确地解释了级差地租的本质。他把级差地租同土地相对肥沃程度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把安德森（而不是斯密）称为现代地租理论的发现者。

亚·斯密对土地价格的解释也前进了一步。他把地价解释为地租的资本化。他把地价同利息相联系，比配第有了进步。今天，在理论上，我们也是这样看待地租的。①

① 从上下文看，应为地价而不是地租。——译注。

马克思很注意斯密的地租论。在批判地改造这一理论的同时，也利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对斯密看出了租金上的垄断因素给予很高评价。强调垄断是租金的因素，乃是承认绝对地租的重要一步。土地私有垄断就是绝对地租产生的起因。马克思回答了斯密仅仅提出的许多问题。斯密地租论中的科学因素成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今天，研究《国富论》，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对它的歪曲，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 亚·斯密和现代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国富论》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Ю·Я·奥尔谢维奇教授

马克思在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变革过程中，把亚·斯密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同庸俗因素区别开来，批判地吸取了前者，从而证实了资产阶级古典的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庸俗政治经济学至今仍在完全否定斯密学说与把它理想化之间摇摆不定，与其说他们研究他的著作，不如说是以各种方式歪曲它的内容。

当今西方公认的“传统理论”的危机（既指“新古典派”也指凯恩斯理论）使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分裂成为对立的派别。同样，“西方”对斯密及其《国富论》的评价也是矛盾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斯密是一位伟大而又误入迷途的贤者。他们认为斯密仅仅在发展论的个别问题上持有正确的判断，而对再生产机构总的复杂过程的理解程度，则比有名的反动分子劳德代尔和大剽窃家马尔萨斯低得多，充其量比狭

隘的道德论者耶·边沁强一些。^①因此，凯恩斯主义者一般都不强调斯密的地位。新凯恩斯主义首领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所列的学说发展系统表就表明了这一点。

社会制度学派（新社会学派）对斯密的态度，继承了早期反斯密主义者新旧历史学派和社会学派的传统，采取了婉言“谢绝”的作法。

在这个学派看来，亚·斯密的著作在一个崭新的面目全非的世界上已经丧失了意义。加尔布雷思认为它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圣经一样地过时了。他在《工业国》一书中，把《国富论》作为“趋向美”的封建主社会与“违背美”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界桩加以引用。

加尔布雷思认为，亚·斯密是马克思的对立面，凯恩斯的同道者。他在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家把对非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所作出的获得公认的那类阐述，称作新古典模式，其余的人则把它称为经济学。它的主要根源是亚当·斯密的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②

他又说：“斯密的观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由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詹姆斯·穆勒、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大大加以发扬，后被称为古典体系。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又由奥地利、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作出了所谓边际分析，由此终于使古典派这个词被新古典派所代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作了两次较大的

① J·M·参阅：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48年，俄译本，第341—342，348页。

② J·K·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33页。

修正。”^①这两次较大的修正,指的是“完全竞争理论”被寡头理论所代替;古典派理论被国家调节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所代替。这样一来,新古典体系有了一种“最终的形式”。加尔布雷思这番回顾的目的何在?他自己作了回答:

“新古典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传统的力量为靠山的,对一度存在的社会加以描写,就容易使人听来入耳。”^②这一体系为什么重要?“学生来上课了,总得教他们些什么,而新古典派模式就在手边。”^③

加尔布雷思不愿看到,在联结着亚·斯密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表面跳板之下,是将二者分隔开来的万丈深渊。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有科学的历史主义精神吗?

“新古典学派”和同它相近的“新自由主义”对亚·斯密的态度,是由两方面互不相容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力图把斯密说成自己理论的直接奠基者。另一方面,力图抛掉斯密学说中基本的和正确的东西,坚持次要的和错误的东西,

“新古典派”肆无忌惮地歪曲斯密的著作,企图把以上两方面的因素捏合到一起。他们硬要把斯密引为自己的始祖,尽管这是不合理的。而西德的“新自由主义者”则借艾哈德之口,把亚·斯密说成“社会市场经济的预言家。”^④

到3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灾难归咎于“新古典派”,认为他们过于信赖亚·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70年代的今天,“新古典派”反过来责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拙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白林斯提出,从

①②③ J·K·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页。

④《经济周刊》,1976年,第11期,第48页。

凯恩斯回到亚·斯密去。

值得考察一下许多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下述看法，即只要重新“正确地”阅读亚·斯密的著作，“西方的”理论就可摆脱危机。换句话说，按照当今资产阶级理论的标准“翻新”亚·斯密的理论。

西德经济学家列腾瓦尔德在《亚·斯密生平及著作》一书中发表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①

列腾瓦尔德认为，亚·斯密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在一个物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不断地追求改善自身的命运，获得邻人的尊重而又不损害别人。”^②亚·斯密有价值的提法，是“在最大限度个人自由条件下，使人人都获得利益和满足。”“在斯密那里，善与恶是十分公平地分布于各个方面的。”亚·斯密为“普通人”和“劳苦大众”代言，但没有“虚构的理想主义”和“片面性”。亚·斯密的学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违反人道的阶级斗争学说尖锐对立的和平文告。”

列腾瓦尔德赞扬亚·斯密“十分英明”，并且预计，“亚·斯密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许多东西”。他接着说：“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斯密如何从一些简单的前提（交换与贸易在分工深化基础上的扩大）说明了封建统治的灭亡，以及随后资产阶级社会的成长——这是史无前例的非暴力的不流血的革命。”^③列腾瓦尔德还企图把未来社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分工、商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在遥远的未来社会问题上，而且在眼前事件上，他都以现代改良主

① H·列腾瓦尔德：《亚当·斯密生平及著作》，1976年，慕尼黑。

② 引自：《经济周刊》，第49页。

③ 引言：《经济周刊》，第51页。

义精神去“解释”亚·斯密。在他看来，“亚·斯密对以下两个中心问题提出了今天仍可采纳的方案：在自由社会制度下，哪些任务应由国家完成，哪些由市场实现，为了保证统一有效地履行使人人致富的上述任务，应有什么样的结构。”^①

最后，列腾瓦尔德把自己的观点同斯密学说牢牢地等同起来，并且这样攻击自己的论敌：“他（亚·斯密）的自然自由主义思想（这一自由是文明高尚的，但不是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无限制无任何强制的自由），以人同其所有对手的实际行动为基础；亚·斯密没有把人的品格整齐划一，使之在集体中不至泯灭。依照斯密的看法，人既不应受剥削，也不应受再教育。”^②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亚·斯密：一、他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解是符合帕累托^③的主观主义最佳条件的精神的。二、他是“阶级和平”的拥护者。三、他赞成渐进地非强制地改造。四、他拥护市场——国家经济，反对剥削和再教育。

换句话说，亚·斯密同列腾瓦尔德一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列腾瓦尔德先是毫不客气地把他所辩护与赞扬的世界说成是伟大斯密所赞同的，然后把自己（以及所有的社会—市场经济拥护者）打扮成这位苏格兰古典学者的现代追随者。

亚·斯密的理论，是在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西欧和北美

① 引自：《经济周刊》，第51页。

② 引自：《经济周刊》，第52页。

③ 维·帕累托：（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洛桑学派（属数理经济学）的主要代表者之一。——译者注

各国的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尖锐的时期提出来的，斯密企图寻求这一危机的内在根源，并且提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过时的封建秩序同新生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各国原来的统治所造成的风俗习惯，必然使经济发展走上反自然的退化的道路。事物的自然顺序，“虽然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顺序却就许多方面说，似乎完全相反。”^①

有一种说法，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新的上层建筑（适应前此已经自然地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基础）代替封建的上层建筑。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变革，首先发生在基础中，发生在土地所有制中，而土地是当时社会财富的基础。研究一下1789年开始的法国农业改革的形式，就可看到，早在1776年，即革命前13年问世的《国富论》已从理论上论证了法国流血的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农民和资产者捍卫了自己从旧的所有者手中重新夺来的财产。而列滕瓦尔德向我们讲述的却是关于斯密的神话，说他赞成经由分工使资本主义“不流血地”代替封建主义！

亚·斯密指出，束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封建枷锁，使资产者不得不最先把资本用在对外贸易上，然后再逐渐用到手工工场中，最后才用到农业上，尽管农业是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

向列滕瓦尔德提出下列问题是适当的：假如亚·斯密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源不是以应有的规模用在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部门（食品生产、教育、保健、住宅建设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49页。

等），而是用在建立军工厂、汽车工厂和烟草工厂等部门，他会说些什么呢？他无疑会说，“事物的自然顺序被完全颠倒了，”并且会解释说，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风俗习惯”决定的，即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风俗习惯决定的。

亚·斯密曾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①那末，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1730万失业者该说些什么呢？他无疑会说，这是对“神圣财产”的不正当地侵犯，是对“劳动者的正当自由”的不可容忍地破坏，这妨害他们“使用自己的体力与技巧”——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这种破坏比封建学徒法规更加不能令人容忍。

资产阶级货币流通理论家们，应当反复阅读一下斯密下述简单明了的说法，它在今天通货飞速膨胀条件下，显得多么有现实意义啊！斯密说：“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提。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②

也不难看出，亚·斯密会因他颂扬节俭和励斥浪费而受到凯恩斯主义者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对斯密思想的深刻歪曲和以高布赛克的心理来描绘他为基础的。^③

假如亚·斯密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当一部分国民收入被用于军备竞赛和寄生消费，他会说些什么呢？他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15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90页。

③ 高布赛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法国早期金融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

会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浪费。假如反驳斯密说，为了维持“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这些浪费是必要的，而节俭将导致失业，那末，他显然会说，浪费并不会使资本主义免于危机，而节俭也不是指吝啬骑士的贪心，而是指生产性地使用全部国民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度就业。他说，“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①

为浪费进行辩解，不过是18世纪末封建主义和本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共同历史命运的外部表现，它使凯恩斯主义者同亚·斯密相对立，而同劳德代尔、马尔萨斯亲近起来。

亚·斯密非常切合实际地向资产阶级世界的活动家们发出警告：在这个世界中，相对合理的上层建筑不是以财产而是以进步为基础的，而且它只存在于经济继续成长之前。

回顾一下亚·斯密下述的这番话，对于西方争论“零度增长速度”的人们是有用处的。他说：“也许值得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②

当今资产阶级制度的危机，同18世纪末封建主义的危机一样尖锐。为了弄清危机的根源，应当象斯密那样，进行深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2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4—75页。

入地考察，揭示生产、所有制关系、交换和分配方面阶级利益的对立。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才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亚·斯密所有真正科学研究的合法继承者。与亚·斯密不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富有批判精神的人，都患有人为的近视病，因而不能指望得到比表面上显示的更多的东西。

亚·斯密和李嘉图古典学说的科学与进步的内容，使资产阶级在1830年无产阶级公开起义的条件下，抛弃了这一学说的本质内容。

从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上了危机之路，它的庸俗化者开始占了上风。古典经济学的危机，是它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变得不现实时，真正科学的危机。因此，不应把它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相提并论，后者是在古典资产阶级科学衰落时兴旺起来的。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动力虽然也是阶级斗争，然而它的运动完全遵循着不同于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另外一些规律。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它以哈哈镜歪曲反映所研究的问题有关。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公开放弃了科学经济理论的根本任务，而致力于掩盖一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制度的内在辩证法。他们只以社会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为研究对象，他们首先依附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断更替的社会政治学说，并对它加以发挥。

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广泛利用了斯密和李嘉图体系中的描述性因素，加强了同其科学遗产“相分离”的过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发展的特

征，是以主观心理来填补业已出现的“理论真空”，论述的问题都经过了边际主义变形。

资本主义总危机，要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加强它的社会一辩护性，同时加快走向实用—描述方向。这就决定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亚·斯密的态度。

大家知道，斯密学说的矛盾集中在内在方法与外在方法上。外在方法是科学的必要前提，但它还不科学。科学发端于显示规律的地方。脱离了理论分析和概括的描述会成为庸俗的开端。回想一下马克思的话是很重要的。他说，粗俗的经验主义产生繁琐哲学。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恰是经验主义和繁琐哲学的混合。它的许多代表人物公开承认“西方的”理论陷入了形式主义、公式主义和繁琐哲学的泥潭，正企图借助于经验主义来“拯救”理论。

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拒绝亚·斯密所有的科学理论，诸如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说，关于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学说。他们拒绝斯密学说的进步因素，即要求不妥协地消除所有阻碍经济进步的东西。他们拒绝斯密学说中那些非暂时的有价值的思想，而只注意那些早已失去了进步意义的东西，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从革命的转变为反动的那些思想，诸如维护私有制和企业自由，诉诸人的利己主义等等。

真正的科学总是革命的。亚·斯密著作的科学内容表现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作了经济论证。因此，亚·斯密著作的科学核心是革命，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则是保守或公开的反动，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正因为如此，斯密的学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亚·斯密学说的相近之处，不是在整体上，而只是在他的弱点、错误、缺陷或纯粹外表描述上。例如，张伯伦从斯密那里采用的，只是生产内部分工理论以及关于企业规模对生产成本影响的说明。在张伯伦看来，这些理论与说明有助于在经济理论中进行数学抽象。^①

按照另一位著名美国理论家保尔金的说法，“瓦尔拉、马歇尔和希克斯的全部价格理论，已经无可争辩地包含在亚·斯密的名义价格学说中了。”^②但他对斯密的名义价格论中主要的东西，也是这一理论矛盾的内容，即劳动的基础，不置一词。

列腾瓦尔德同意斯密的只有一点，即他关于促进建立各国间和平关系的学说。但列腾瓦尔德又不必要地在“自然的自由”原则即自由竞争原则上寻求和平关系的基础。亚·斯密提出，各国致富的源泉，是它们的生产工人的劳动，这种劳动获得的财富越多，它同别国劳动所得到的互利与协作就越多。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亚·斯密学说才有助于建立和平国际关系。

在《国富论》末尾，亚·斯密建议，英帝国的领导者应“努力使未来的企图与计划，适应自己资源贫乏的实际情况。”^③亚·斯密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他在国内外问题上所提建议的多样性，仍是使人惊异的。

① 参阅：E·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第七版，俄译本，第322—323页。

② 引自《经济周刊》，1976年，第11期，第48页。

③ 参阅：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第511页。

第二节 资产阶级歪曲亚·斯密经济学说的赝制品

Л·Н·斯彼拉斯卡亚副教授

在资产阶级的历史—经济文献中，分析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研究他的著作，特别是研究《国富论》，占有很大比重。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承认斯密学识渊博，但否认《国富论》有理论上的创新，认为它只不过是前人理论的编纂而已。

例如，熊彼得在《经济分析史》的“亚·斯密指南”一篇中，硬说亚·斯密著作的内容毫无新奇之处，因为他没有分析能力。又说《国富论》没有包含任何一点在1776年是全新的思想、原理或方法。^①他认为，斯密的成功不在于他的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普及了自由贸易这个主题，成了自由贸易的宣传家。熊彼得还想让斯密声誉扫地，他说：“假如要他得出更难以达到的真理，利用复杂细致的方法，他就不理解了。不过他也没有这样的抱负。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超过那些甚至最迟钝的读者的理解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贝尔，巴尔贝，惠特克也赞成这一观点。这样看待斯密及其著作是完全错误和不符合实际的。

亚·斯密《国富论》囊括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经济知识和问题，创立了经济科学体系。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重新“整理”了政治经济学，以具体的经济问题取代了对主要经

① I·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第173页。

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研究。

资产阶级学者把《国富论》描绘成毫无系统的著作，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理解他的方法。其中一些人把斯密的方法仅仅归结为演绎法。例如，惠特克认为，亚·斯密理论是“以演绎法所得出的关于财富的一系列原理。”^①另一位美国经济思想家汉纳，把斯密方法的特点局限于他的唯物主义态度，首先是对人类行为动力问题的态度。汉纳说，唯物主义使斯密得出经济人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尤其受到物质利益的支配。”^②

还有一些学者（包括加尔布雷思在内）指出了斯密研究方法上的矛盾，这一方法使他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解释。但加尔布雷思把这看作斯密的功绩，并建议现代经济学家也走这条道路。他在《丰裕社会》一书中指出：“他（指斯密）几乎对于任何一桩事情都没有说得很绝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当他们追随他的榜样的时候，他们经常是表述得最好的。”^③其次，加尔布雷思把表面的研究方法（使斯密得出非科学概念的方法）看作是富有成效的方法，建议在现代经济研究中积极地利用它。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正确地评价亚·斯密的主要著作以及他对某个问题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片面理解他的方法，忽视了它的特点。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亚·斯密的方法作了全

① E·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纽约，1969年，第187页。

② A·汉纳：《经济思想史》，纽约，1968年，第233页。

③ J·K·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页。

面深入地分析。^①他指出，斯密突出的功绩（象其它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在于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依存性。

价值理论是斯密经济学体系中最重要问题之一。因此，资产阶级注释者们主要致力于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意义，首先庸俗化他的价值论。例如，贝尔在其《经济思想史》中说，“斯密在价值论上的贡献比初看上去要模糊得多。错误、缺点和矛盾损害了他的学说。……认为劳动应被看作全部价值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然而，社会主义学说的价值论多半是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②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斯密理论的非科学说法加以绝对化，企图把他说成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同时，他们把斯密的真正科学的成就，例如劳动价值论，说成站不住脚的东西，并指责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学说。贝尔利用斯密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攻击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一般来说，亚·斯密并未解决价值的“反论”，^③并没有进一步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

加尔布雷思把斯密的价值论解释为类似边际主义的东西。他说：“斯密说明价值时认为还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区别开来的好，这样用以调和高的效用和低的交换能力之间的自相矛盾。这种区别是以本身尚待证明的原理作为论据，而不是解决问题。一百年来经济学家寻求一个满意的表述公式。最后直到上世纪终了……三位边际效用的经济学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181—182页。

② G·贝尔：《经济思想史》，纽约，1953年，第188—189页。

③ 价值的“反论”，指的是下述论题：有些使用价值很大的物品，价值很小（例如水），而另一些价值很大的物品却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例如钻石）——译者注。

家（门格尔、杰文斯和克拉克）多少在同时形成了大体说来对现在还有用的解释。”^① 惠特克同意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亚·斯密价值论的矛盾可以在边际主义原则基础上予以解决。他把边际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看作是“在经济理论中复活亚·斯密奠基的古典派思想。”^②

以上列举的对斯密价值论的解释，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密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中，正是以效用论的最早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令人信服地证明，物品只是在生产它们耗费了劳动时才有价值，只有劳动能够成为价值尺度。物品的效用，虽可满足各种需要，却不是价值的标准。

如果说多数资产阶级的斯密研究家，把斯密价值论的某种非科学的说法提到首位（购买劳动决定价值，用劳动的烦劳说明价值源泉，或把斯密价值论说成效用论），那末，熊彼得则将它划分为三种“不可调和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并对其中每种说法加以评论。他认为，斯密的第一个价值定义，“在逻辑上不能用来解释价值现象。”第二个理论，斯密把劳动看作工人的主观的牺牲，可以略而不论，因为斯密对这种劳动的烦劳未曾作任何发挥。第三种对价值的数量解释，依照熊彼得的意见，同强调劳动因素相反，不是劳动理论。^③ 而生产费用论（熊彼得在此是正确的）则不能作为价值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熊彼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亚·斯密那里，实际上没有价值论。

在《国富论》中，以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价值论的第一个科学的表述。把商品价值归结为耗费在其中的劳动，归

① J·K·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2—123页。

② E·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纽约，1969年，第206页。

③ I·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第178，310页。

结为一般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脑力与体力的消耗），这就是斯密得出的重要结论。在总结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时，马克思强调指出：“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①正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而且是他的最伟大功绩之一。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注意歪曲亚·斯密的分配论。象分析价值论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一开始便提出斯密的错误原理，而把合理的因素掩盖起来。首先，资产阶级的斯密研究者忽视他的分配论中的合理方面，对斯密按照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所作出的收入分类默不作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兴起了一种边际主义者所宣扬的职能分配论。根据这个理论，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取决于它们的“价格”。而每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又同它们所生产的边际产品成比例。生产要素的价格及其数量决定了每一要素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

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今天企图在斯密著作中寻找它的来源。贝尔认为，斯密分配论中最好的观点，就是他似乎承认土地、劳动和资本在财富的国民基金生产中是相互起作用的。因此，在斯密那里只有一点点迹象的生产三要素论，便博得了特别的赞扬，后来的边际生产力论者把这个观点当作一种武器。

在分析分配理论时，亚·斯密对工资、利息和利润的解释被歪曲或简单化了。例如，惠特克跟在熊彼得之后，认为斯密的工资学说是他的最大科学成就。认为他的功绩在于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64页。

工资下定义为对劳动的支付。但是，恰恰在这个把工资看作是对劳动的自然报酬的定义中，特别明显地反映了斯密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认为，工资是经济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具有的永恒范畴，而劳动则同其它商品一模一样。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工资问题，他们不理解，在出卖劳动的背后，掩盖着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但是，斯密把工资看作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一部分，同时对必要工资的实质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他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① 惠特克却故意回避这个科学结论。

亚·斯密关于利润本质的结论显然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恼怒，因为他把利润看作对劳动产品的扣除。贝尔并不隐讳这一点：“对亚·斯密把利润下定义为工人无偿劳动的结果持否定态度，同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密切相关。”^② 熊彼得很欣赏斯密把企业主收入解释为对资本家的风险报酬。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惯用的手法：对斯密著作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以便大大抬高其中的庸俗因素，而把真正的科学成就掩盖起来。

亚·斯密根据自己正确的价值论，对资本主义收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在斯密那里，已经有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因为他把利息看作货币资本家在利润和地租中占有的份额，而利润和地租早先已被归结为无偿劳动时间。斯密不想用资本家的兴趣解释利润，而追求科学的答案。斯密跟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不同，承认利润是资本主义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2页。

② 贝尔：《经济思想史》，纽约，1953年，第190页。

收入的独立形式。马克思认为这些也是亚·斯密的功绩。尽管斯密害怕承认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而他的理论也是不彻底的和矛盾的，但是，不能象庸俗经济学家通常所作的那样去解释斯密，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他是一位进步的研究者。

亚·斯密的资产阶级注释者，认为斯密的地租论对他们较为有利。这一理论是斯密学说中最矛盾的部分之一。斯密对地租源泉提出了好几种解释。基于劳动价值论，他把地租看作农业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他说：“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从用在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①他又把地租看作自然力作用的产物。这种说法反映了重农主义的影响。最后，他还把地租看作对农产品的垄断加价。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斯密见解中类似的矛盾作为正面的东西加以强调。贝尔认为，斯密最成功之处就是把地租下定义为自然界的恩赐。而对斯密的其它观点则不加理睬。对斯密关于利润和地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工人无偿劳动的结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是予以批判或有意保持沉默的。正是这些最有价值的科学成分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武器并被马克思主义所发展。

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斯密关于资本的学说视为研究思想的成就。不待说，亚·斯密在解决资本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他指出，利润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的。他把产业利润划分出来作为资本主义收入的基本形式等等。然而，他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9页。

的资本定义是不正确的。他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源。他说：“他（指资本家）希望从而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①

美国经济思想史家惠特克认为，亚·斯密的资本理论是批判地考察魁奈经济学说的成果；魁奈所说的原垫支在斯密那里变成了固定资本，而年垫支变成了流动资本。但这并不合乎实际。斯密的资本理论是很复杂的，当然值得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惠特克没有指出，把资本自然主义地理解为生产所需的资源，就会抹煞资本的阶级本质。斯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学说仍然是很不清楚的，有许多错误和模糊之处，因为他划分两者的标准是混乱的。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尽管对斯密学说的评价以及对他某个政治经济学范畴上的解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大多数资产阶级的斯密研究者都有下述特点：把斯密经济学体系中非科学的因素提到首位；否定他的学说中最重要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攻击斯密关于利润和利息的剥削本质的结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用曲解或伪造亚·斯密理论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第三节 论亚·斯密科学著作在现代资产阶级 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庸俗化

【东德】X·沙克斯教授

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无视亚·斯密所作的古典的科学结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4页。

论，或者对它们进行庸俗的解释，抹煞其科学内容。他们把斯密的庸俗经济观点看作他唯一的有代表性的观点，或者认为基本上代表了他的观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家的这种态度，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斯密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极重要组成部分的解释上，特别是他的价值论、工资论以及利润、利息和地租论。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家们否定斯密的古典价值论。为此，他们一开始就无视斯密的下述观点：人类劳动的特点是创造财富与价值的活动。例如，茨弥尔曼说：“古典作家们所说的‘劳动’，指的是劳动的自由时间的牺牲。”^①布劳格更加深了对斯密的劳动观点的主观主义歪曲。他说：“斯密所谓劳动不是指一定的小时数，而是指丧失的效用和个人劳动的心理估价。而所谓价值，与其说是交换价值，不如说是主观价值。”^②

这样评价亚·斯密，把他看作主观效用理论家，甚至看作非科学的主观价值论的奠基人，就为完全否定他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企图强化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原理。他们从斯密的错误观点（把工资、利润和地租当成全部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出发，不仅把他说成资产阶级的主观价值学说的创立者，而且说成庸俗生产要素论的创立者。同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家一样，沙哈别尔说：“对他（斯密）来说，劳动这个生产要素是发财致富的真正源泉，……但是，按照斯密的说法，劳动毕竟不是唯一的要

① 茨弥尔曼：《国民经济学史》，1967年俄译本，第259页。

② 布劳格：《经济理论系统史》，第1卷，1971年俄译本，第110页。

素，……与劳动一起，还应把资本和土地作为价值尺度。”^①

否定斯密工资学说的科学成分，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为此，他们把斯密关于工资的各种说法推到前台，并且彼此分隔开来。布劳格就是这种作法的代表。他强调说：“第8章（指《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只是工资理论的扼要叙述。在20多页中，我们看到了极不相同的工资论：工资基金论，物质论，“协议”论，某种形式的生产力论，甚至剩余分配论。”^②他想造成一种印象：斯密关于工资尽管写了许多，但没有讲出什么重要的东西。对斯密关于工资是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原理，或者是生产必需品所必要的工作时间之货币表现的原理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不予置理。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对斯密关于剥削、剩余价值或利润问题的解释，是半真理、歪曲和庸俗化的混合。例如，克鲁兹这样解释斯密：“在探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根本原因时，亚·斯密硬说是人类劳动，……可见，对他来说，劳动暂时还是价值的唯一原因。但经验向斯密表明，劳动除了提供维持工人的支出以外，还提供剩余收入。”^③

沙哈别尔的思想也说得很明白：“（在亚·斯密那里）一方面，资本是新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④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尽管有时对斯密的重要思想作了大体正确地说明，但他们不愿也不能理解斯密所指出的剥削过程

① 沙哈别尔：《国民经济学史》，1971年俄译本，第47，49页。

② 布劳格：《经济理论系统史》，第1卷，1971年俄译本，第110页。

③ 克鲁兹：《国民经济理论史》，1959年俄译本，第52页。

④ 沙哈别尔：《国民经济学史》，1971年俄译本，第50页。

的基本的相互联系。在斯密揭示了内在本质联系的地方，他们只是提出矛盾和对立，目的在于把他关于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观念的价值降到一种矛盾的和不甚重要的水平。

亚·斯密指出：“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①他认识到，利润是雇佣工人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它是工人无偿地提供给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企图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对它加以歪曲。克鲁兹说：问题在于，别人全部地或部分地获得剩余收入是否合理。斯密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把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在原始经济阶段，人们还没有资本，也没有土地私有权，即全部资本属于生产者。只是在形成了土地私有权和资本所有权时，资本和土地所有者才开始因利用他们的财产而得到一定份额的产品。因此，在斯密那里，只有在原始经济中，劳动价值论才起作用。在最后一阶段，起作用的是生产费用论。”

克鲁兹表面上似乎正确地叙述了斯密的思想，但实际上对他的解说是歪曲的。一方面，他抛开了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由谁来创造这一本质方面。他实际上否认对剩余产品的无偿占有，把它归结为对资本所有权的使用。另一方面，克鲁兹又曲解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他的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把它解释为费用论，而忽视劳动创造了作为利润基础的价值。这就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否定斯密著作中关于剥削的全部思想打开了大门。克鲁兹说：“如果由此作出逻辑上进一步的结论，亚·斯密就应当同意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工人受资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本家剥削，他们在利润和利息的形式上失掉了一部分劳动收入。但是，未曾有过这种事情。”^①

马克思断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能科学地说明自身的历史，这已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他们对待一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古典派体系奠基者亚·斯密的态度，特别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维护亚·斯密的著作，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对它的任何歪曲与伪造。同时，应当牢记并在实践上坚持列宁的下述论断，即工人阶级是全部历史进步传统的可靠继承者，他们尊重以亚·斯密为代表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亚·斯密的科学著作乃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第四节 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家

对亚·斯密著作的态度

Г·Д·查努瓦兹教授

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中，《国富论》及斯密主义占有显著地位。围绕着斯密理论遗产的思想斗争从未停息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家总是企图对《国富论》进行唯心主义的辩护性解释，竭力掩盖他的真正功绩，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理论的缺点，批判它的长处。

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都站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单行线”的立场上。其中一些人只把斯密学说的第一代庸俗化者

^① 克鲁兹：《国民经济理论史》，1959年俄译本，第52页。

(萨伊、巴斯夏、曼彻斯特学派、马尔萨斯、屠能、缪勒尔等)列入古典派(斯密学派和李嘉图学派)。另一些人则大大扩大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含义,被他们列入古典派的不仅有斯密和李嘉图的第一代庸俗化者,而且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所谓“新古典学派”、“新古典综合”、“新古典主义”以及边际主义代表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庸俗经济自由主义放在一条线上进行考察。例如,西德经济学家奥特利认为,亚·斯密是一般自由主义的始祖。^①也就是说,斯密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也是庸俗自由主义的鼻祖。在所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斯密都被描述为萨伊、瓦尔拉、马歇尔、米塞斯、哈耶克和奥肯等人的精神之父。

所谓“新古典综合”的代表者以及复兴斯密主义者(庸俗旧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新边际主义者、“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也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斯密的追随者。例如,普列节尔强调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复活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似乎就是斯密主义的复兴。按照克鲁兹的说法,复兴斯密主义,“就是复兴边际主义”,^②即新边际主义。阿芒更早就维护这一观点。他认为,重农主义者和亚·斯密学说是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斯密主义在19世纪的新古典理论即“新古典主义”中现代化了。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新边际主义者、“新古典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古典主义”代表者们,在否定《国富论》中的科学因素的同时,复活了它的庸俗因素。克拉塞尔指出:“因此,可以断言,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哈耶克和米塞

① H·D·奥特利:《经济自由主义之终结》,威斯巴登,1962年,第18页。

② 克鲁兹:《国民经济学理论史》,慕尼黑,1958年,第55页。

斯，是打着别人的旗号胡言乱语。他们之所以要这样作，是因为论证国家不应干预经济生活的斯密之自由主义理论，在美国的学者和企业拥护者中有许多信徒。”

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史家，对《国富论》都给予肯定地评价，把它的问世视为“斯密革命”的开端。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斯密学说庸俗化。例如，萨缪尔森指出了《国富论》的意义，但对整个斯密学说却作了不正确地解释。他认为，《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开端。^①顺便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按照斯罗克的说法，在斯密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英国殖民政策的鲜明叙述。^②塞利格曼说，《国富论》是一部“历史的论著”、“伟大的著作”。^③詹姆斯认为，《国富论》是经济科学发展中奠基性的基础。^④

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片面地看待《国富论》的作用、地位和意义。他们把所谓“第二次革命”（边际主义和新边际主义的出现）即斯密价值论的庸俗化同“斯密革命”相对比。然后把“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通论》出版和“可调节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出现）同“中间的古典主义”（边际主义者）相对比。接着便考察“新凯恩斯革命”（“经济增长论”的形成，“新古典大综合”等），并且把“反凯恩斯革命”（“新货币理论”，“货币反革命——新货币主义”等）同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相对比。

总之，《国富论》和“斯密革命”被溶化在资产阶级经

① 参阅：萨缪尔森：《经济学》，1964年俄译本，第794页。

② 参阅：斯罗克：《美国科学之形成》，1966年俄译本，第37页。

③ 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1968年俄译本，第28，132页。

④ 詹姆斯：《20世纪经济思想史》，1959年俄译本，第558页。

济思想总的潮流之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在斯密、李嘉图、凯恩斯的主要著作之间划了等号，而且把他们的著作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同起来。他们是这样划分时代的：

“从亚·斯密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最后是“凯恩斯时代”——“新凯恩斯时代和节制凯恩斯时代”。^①忽视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阶级动力，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的特点。

× × ×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把斯密的学说不仅同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等)的理论并列起来，而且同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例如，西德1967年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纲要》是这样排列次序的：斯密、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屠能。^②熊彼得、维贝尔及其同道者走得更远。熊彼得说：“我们力图在三个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体系(即亚·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学说)中找出基本的思想要素。”^③沙林开列的“古典派作家”和“新古典派作家”的单子更长：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古尔诺、帕累托、屠能。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权威维贝尔“深化”和“扩大”了“古典派”与“新古典派”的概念。他的“发现”是：“亚·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学说，由当时及后一代杰出的思想家们完成了。其中值得提出的人有：马尔萨斯、詹·穆勒、麦克洛克、西尼耳、约·穆勒、凯里、萨伊、屠能、

① 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1968年俄译本，第494页。

② 《经济学纲要》，1967年版，第13册，第1页。

③ 熊彼得：“科学与思想体系”(刊《汉堡经济与社会政治年鉴》，1958年，第3卷，第18页。)

格尔曼、曼戈尔特。伟大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罗贝尔图及其社会经济思想也在这个圈子之内。”^①

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②

亚·斯密和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大家知道，《国富论》的一些科学结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然而在李嘉图学说中存在着庸俗成分。马克思以极大的努力划分出并且发展了《国富论》的科学因素。马克思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需要依据《国富论》的一系列科学原理，然而也正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了革命变革。

有些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维贝尔、詹姆斯、斯杜坚斯基、塞利格曼、熊彼得、沙林等）有时也离开资产阶级思想所公认的对政治经济学发展“单行线”的解释。按照这些作者的说法，马克思是亚·斯密的学生，马克思主义是斯密学说的继续和复活。他们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经济学理论同斯密学说，甚至同凯恩斯理论有着思想上的从属关系。他们想把斯密学说“马克思主义化”，而把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化。”

《国富论》的第一批评论者是劳德代尔、加尔涅、施托尔希、马尔萨斯。他们基本上以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评论

① A·韦柏：《一般国民经济学说》，1958年，第7版，柏林，第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19页。

斯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斯密。斯杜坚斯基指出：“可以说，亚·斯密所制定的物质生产的有限制的学说，从它在后来一百年间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严重地破坏了从威·配第开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发展，妨碍了国民收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①

怎样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一种顽固的企图呢？一方面，他们降低《国富论》的意义，否定和庸俗化它的科学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它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拉扯在一起。斯杜坚斯基回答了这个问题：“反对亚·斯密物质生产学说的任何批判性解释，对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无论对其原来的形式，还是现今苏联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形式都适用。”^②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维护者，竭尽全力埋葬《国富论》的科学思想。亚·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劳动价值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起源的秘密。他们对此是不能容忍的。

① 斯杜坚斯基：《国民收入》，1968年俄译本，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第六章 亚·斯密著作在苏联等国的出版与研究

第一节 亚·斯密著作在革命前的俄国及苏维埃时代的出版

T·Γ·谢苗诺娃副教授

亚·斯密生前已闻名欧洲。他的言论也传到了俄国。1761年，亚·斯密教授在伦敦曾与俄国特命全权公使亚历山大·高里钦公爵相识。从1762年起，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两位俄国学生杰尼茨基和特列亚柯夫曾求教于亚·斯密。他们学成回国之时，正值俄国沙皇叶卡杰琳娜二世创建法典委员会。杰尼茨基向该委员会提出过建议。在斯密理论的影响下，他曾提出过（例如）某些限制专制制度和限制地主支配农民的建议。杰尼茨基曾打算翻译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但他五十岁时去世，译书未能遂愿。特列亚柯夫在宣传斯密思想方面也作了贡献。他在1772年出版的《论国家富裕和缓慢致富的原因》一书中，发挥了与斯密相近的思想。

亚·斯密著作在俄国首次出版之前很久，他的观点在俄国已为人所知并在学校进行讲授了。不过，除了印刷品以外

也许就是手抄本了。①

亚·斯密学说对俄国经济思想史较大的影响开始于19世纪。这时候，他的学说在俄国更为人知晓，甚至已很流行了。1802—1806年间终于在俄国第一次出版了他的著作，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个译本是根据财政大臣瓦西里也夫的倡议出版的。译者是波里柯夫斯基。他不太了解经济理论和术语，因此这个译本不够完善。它的优点是包括了《国富论》的全文。②这是一部详尽的篇幅最大的俄译本。但也有一些遗漏、不准确和曲解之处。该译本第一篇题为“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以及生产物在一国各阶级间自然分配的顺序。”其中第一章是“论劳动的分割”（而不是劳动分工）。第二篇题为“论资财的性质、蓄积和使用。”其中第三章是“论资本蓄积或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第三篇题为“论不同国家丰裕的不同发展。”第四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题为“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财政大臣特别感兴趣的显然是解释财政和国家预算问题的第五篇。其中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包括“国防费”、“司法费”、“公共工程设施和教育费”、“青年教育费”、“各种年令居民的教育费”以及“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第二章是“论国家一般收入的源泉，”其中考察了各种赋税。第三章是“论国民的或社会的债务”。

有关亚·斯密专著的出现，增进了人们对他的著作的兴趣。第一本专著是柴哈诺夫斯基的《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历史中的意义》（1859年）③。杜干·巴拉诺夫斯基

① 参阅：A·阿尼金：《亚当·斯密》，1968年，莫斯科，第91—100页。

② 该书出版用了四年，由圣彼得堡国家医学协会印刷厂印刷。

③ 本书已是图书馆馆藏的珍本。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中没有这本书，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其内容。

在题为《亚·斯密》的论文（发表于布洛卡乌和叶夫洛编辑的百科辞典第60卷，第541页）中曾引证过它。1864年，在《现代人》杂志（第九期）上出现了一篇论文，题为“斯密学派和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文章发表在这本内容广泛的杂志上，有助于读者了解斯密的经济观点。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19世纪60年代已取得相当的成功。很有必要出版新版《国富论》俄译本。这项工作是在60年代中期着手进行的。

这个版本的译者是一位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彼得·亚列克谢也维奇·比比柯夫。他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同他的文学研究不相上下。他的试笔之作是关于傅立叶、穆勒、冯特等人的论文。他于1865年发表的《批判地探讨》是反对宿命论的。不过，比比柯夫对俄国科学文献的主要贡献，是他出版了一部《欧洲古典作家丛书》，共计13卷，其中包括亚·斯密、布朗基等人著作的译本。

比比柯夫的俄译本译自加尔涅的法译本（经布朗基校正的）。它附有班达、布朗基、布坎南、加尔涅、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穆勒、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和杜尔哥等人所作的注释，出版于1866年，共计三卷，包括《国富论》的全文。^①比比柯夫所依据的《国富论》法译本，是欧洲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曾出过力的。它的注释在行下，正文准确，几乎不容许对斯密学说有什么庸俗地或歪曲地解释。

附在第一卷的布朗基的论文“亚·斯密生平及著作”，有助于读者了解斯密的性格及创作。加尔涅的详尽的“序言”，说明了斯密著作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把他的学说同法国

^① 这个新译本也是在圣彼得堡戈拉诺夫印刷所印刷的。

重农学派魁奈的理论作了比较，还向读者介绍了斯密的方法。

此后，很快便出现了俄国人研究亚·斯密的许多著作。

亚·斯密的观点，受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了《国富论》的历史意义。他看到亚·斯密的功绩在于整理和概括了丰富的实际材料，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指出，亚·斯密在科学上出现以前，没有谁曾作过如此深刻和系统的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理解和阐明了斯密方法所固有的二元论。他写道，斯密学派未曾指出过这种二重性。然而，由于这种二重性的方法，使这一学派的整个理论都出现了概念的分裂，出现了不断地把如下两种体系混在一起的情形：一种是纯科学的深入事物本质的观点体系，另一种是属于人们的口头语和肤浅的思维方式、不必运用抽象思维的观点体系。到90年代，对斯密著作的解释就显得大不一样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从对亚·斯密的一般评价和对其中的经济政策的注意，开始走上了庸俗化他的学说的道路。斯密学说的伪造者们修正他的劳动价值论，竭力把他推到主观主义者的营垒，使他的学说同奥地利学派接近起来。

在俄国第三次出版亚·斯密的著作是19世纪末的事了。189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索尔达坚科夫的节译本，书名是《国民财富之研究》，编者是谢波金。本书是“经济学丛书”的一种。本丛书的编者谢波金和维涅尔指出，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帮助未受过“起码的初等系统教育”的最广泛的阶层的人进行自学。为此，他们认为最要紧的是翻译出版巴黎的“经济学小丛书（法国与外国）”（沙依尔主

编)。①

这套丛书的俄译本从亚·斯密著作开始出版。完全按“小丛书”原版译出。根据热尔门·加尔涅的说法,为了“不损害对亚·斯密著作的总的印象”,出版者们决定不翻译《国富论》的第三、四、五篇。他们认为,“斯密关于财富的形成、增长和分配的全部学说都包含在他的著作的前两篇中,其余三篇可以作为独立著作加以研究。”②为使读者对被删去的各篇有所了解,在前两篇选辑的末尾,又节录了加尔涅的论文“对亚·斯密学说的系统说明”以及全书各篇的标题。正文之前还有一篇论文“亚·斯密生平及著作”,包括两篇短论。一篇是前已提到的布朗基的前言,另一篇是库塞尔—塞涅尔为巴黎“经济学小丛书”第一册所写的前言的一部分,他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说明亚·斯密同重农主义者的关系。卢森贝批评了这种选辑本。③他正确地指出,亚·斯密在前两篇中只是说明了一般经济理论,而它的不可缺少的继续和更好地注释,则是其余各篇,尤其是第三、四篇。1895年版本(1908年和1924年再版)把斯密的一般经济理论同其余的部分分离开了。

1907年,在俄国第四次出版了亚·斯密的著作,书名是《国民财富之研究》。④这个版本是对上述“小丛书”转译本的修定和增补。译者是谢波金和考夫曼。马努依洛夫参加

① 这个法文本包括了政治经济学优秀学者许多著作的节选本,它们“不是逐字逐句,收录原著,而是逐句摘录有价值的章节”而选辑的,每一本专收一个作者的著作,并附有作者小传。

② 亚·斯密:《国民财富之研究》,莫斯科,1895年,第255页。

③ 参阅: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一卷,第255页。

④ 该书前言注明日期为“1907年11月”;但未注明出版年份。

了出版计划的制定。与第一版相比，这一版的宗旨有所改变，它已不是面向自学者，而是面向大学生和对经济科学感兴趣的青年学生。第二版的变动包括：第一，去掉了布朗基和库塞尔·塞涅尔的绪论文章，换上了列塞尔的文章（译自《国家科学辞典》）。第二，补译了《国富论》的某些章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斯密学说在所有俄文版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中都占有牢固的地位。^①在沙皇俄国，亚·斯密的研究者们，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认识他的真正功绩。他们把斯密的观点同其资产阶级注释者马尔萨斯的观点等同起来。而马尔萨斯依据的只是斯密价值论的庸俗的提法。他们企图利用斯密的学说为统治阶级辩护。他们竭力歪曲和抹煞这一学说的实际成就，掩饰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在苏维埃俄国，对斯密理论遗产的注意大大增加了。^②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随着教育的发展以及高等学校中社会科学的设立，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的著作的兴趣大为提高。1924年《激浪》出版社出版了亚·斯密的著作《关于财富的研究》，由雅先柯教授编辑并作序。它基本上沿用了

① 参阅：A·琼布洛夫：《政治经济学史》，1908年。A·米克拉舍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史》，1909年11月26日。（米克拉舍夫斯基还在《货币》一书第四章“劳动价值论”中，用一节叙述斯密学说。《货币》一书是联系货币史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尝试，莫斯科，1895年）。莫斯科大学法律学讲义（第九册），斯瓦多拉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史纲要》，1910年。C·H·布加乔夫：《政治经济学史概论》，1910年，И·李德：《经济历史》，1915年，И·世杰因《社会问题》，1899年，Л·普拉斯：《政治经济学史》1907年。

② 亚·斯密的经济观点，在苏维埃俄国的高等学校是经常研究的对象，出现了许多有关它的教学法的文献，特别在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中，有专章叙述。1924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经济学说史》教科书，（1913—1922年间，它曾作为大学讲义），著者П·雅先柯，还可参阅：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1935年，1940年。

1908年谢波金和考夫曼的译本，没有多少改动。不过这个版本已经不能满足对斯密著作不断增长的需要和新的兴趣了。1926年，乌达里乔夫教授主编的丛书开始问世，总书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及其发展》。这套丛书的第一册是魁奈、斯密和李嘉图著作选集。书名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先驱者》。^①

1931年，苏联第二次出版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个版本是完善的：分为上下两卷，共计五篇。这一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取决于（正如编者强调指出的）必须回击资产阶级对亚·斯密的歪曲。苏联历史—经济科学30年代就已起来反对歪曲斯密的遗产了。顶着教授头衔的“资产者的雇佣奴仆们”认为斯密学说“不科学”、“过时了”、“已被推翻了”。苏联学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资产阶级，“以恐惧和敌视的目光看待自己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派理论。”他们不仅不能前进一步，而且比古典派后退了。他们以自己的眼光把古典派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洗刷得一千二净。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伟大的争取解放的理论）利用了古典派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发展了它。这是资产阶级的斯密研究家嫌恶《国富论》及其作者的重要原因。

30年代初，苏联科学界批判了在如何看待马克思对待斯密和一般古典派的态度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修正主

① И·乌达里乔夫教授在说明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时写道：“我们坚决主张，至少在经济院校，必须着手进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工作。我们认为，只有很好地了解以往的经济理论，才能避免我们有时犯的理论上的失误。我们的经济理论和策略（有时又回到了我们亲眼目睹的争论中那些早已被驳斥的形形色色错误见解）、甚至理论建设显然是资产阶级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先驱者》，乌达里乔夫主编，莫斯科，1926年，序言）

义。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追求资产阶级的理论风格，以“社会学派”捍卫者姿态出现。而“机械主义”代表者，信奉机械地“组合”原则，否认现象的本质区别。他们抱着把马克思“归入”古典派的修正主义企图，抹煞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原则上新的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抹煞由此而使它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变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事实。可见，30年代出版和研究斯密的著作的使命，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它的歪曲，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1935年，在苏维埃时代第三次出版了亚·斯密的著作。这一版分为两卷，主编是乌达里乔夫。序言包括亚·斯密的简略生平和对《国富论》的一般说明，其中包括这本书的结构、内容和方法。序言作者强调指出了斯密的个人主义同社会学中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区别。作者指出，斯密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反映，这种关系是作为单个个体的局部关系在社会的表面表现出来的。而民粹派的主观主义则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这一版的前言回击了资产阶级伪造者，后者企图证明“自然规律”思想破产了，说它是“反道德的”。为了反驳资产阶级思想家，序言作者援引了列宁旨在反驳司徒卢威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把“自然规律”思想同反辩证法的谬论和胡说区别开来。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派摸索到了一系列“自然规律”，但他们不理解它们的历史过渡性，没有看出其中的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纠正了这些缺点，从而使自然规律思想成为经济理论的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为，亚·斯密理论的缺点，在于以这一思想为基础。这是根本错误的。其实，斯密方法的缺点，在于他对这

一思想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可见，新版本是同经济思想中的修正主义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

1962年再版了《国富论》。阿法纳谢也夫所写的序言，对亚·斯密的著作作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在现代（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中，亚·斯密学说占着应有的令人尊敬的地位。苏联科学界认为，亚·斯密著作的意义，在于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科学的研究（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内）。亚·斯密以强有力的科学武器武装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指出封建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在亚·斯密创作这部著作100年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开始拒绝他的科学理论。200年后的今天，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在曲解斯密学说的同时，和萨伊、马尔萨斯一样，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总想利用斯密理论中的错误原理和他的价值论中的庸俗提法。

第二节 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对 亚·斯密理论遗产的研究

保加利亚对亚·斯密学说的研究

〔保〕A·A·米拉舍夫斯基教授

亚·斯密的经济学说早已传入保加利亚，尽管该国资产阶级对它采取消极的态度。

经过俄土战争，挣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枷锁之后，保加利亚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时，古典的资本主义已经日落西山了。但是，与此相反，作为英国产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又在保加利亚土地上重新成长起来。这些形式尽管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大变化，但它与亚·斯密的思想并不对立。其次，这些思想在当时有助于迅速克服经济中的封建主义残余，使资产阶级力量更加巩固。因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斯密的《国富论》阐明了作为反对旧世界的新世界的化身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被用来维护新生的资本主义，反对封建桎梏。

但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不久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排挤到后面去了。终于变得反动的西欧资产阶级，把自己顽固落后的观点灌输到保加利亚的经济思想中。保加利亚资产阶级越来越走上了有利于它同西欧垄断资本相互关系的道路。他们便在抛弃了斯密观点、掩盖资本主义发展消极倾向的其它思想中寻求出路。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奠基人德米特里·布拉高也夫写道，在当时保加利亚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和理论研究中，弥漫着一片衰败景气。在所谓历史—美学学派（它是这一衰败的后果）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科学中出现了最庸俗的观点。20世纪初保加利亚经济思想的状况，实际上是已经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和反动经济观点的反映，其主要任务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亚·斯密的经济学体系。

1920年，在自由资产阶级影响下，亚·斯密的主要著作被译成保加利亚文。这个译本是“财政生活”股份公司出版的。开头的短评指出，斯密的著作在文明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但它又试图推翻斯密的那些资产阶级所不满意的、客

观公正的见解，说它们不准确、不科学或过于简单。例如，短评认为，斯密谈到雇主同工人之间在劳动报酬上的争执是多余的，没有对科学提供任何新东西。短评作者责备斯密，不该把雇主和工人对立起来。在作者看来，工人在资本家支配下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他们作为独立工作者时要大得多，他们的状况也比过去好得多。

短评作者还认为，斯密著作有很多弱点，是因为他把阐明科学规律和纯粹实用性研究混在一起了。同资产阶级思想不同，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自己活动的初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其中包括亚·斯密），表现了肯定的态度。例如，布拉高也夫早在本世纪之初，就对斯密著作对经济科学发展的意义作过高度评价。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吸取了前人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成果。

1947年，保文版的魁奈、斯密和李嘉图著作选集问世。该书的序言指出，研究马克思的先驱者，有助于更好地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在今天的保加利亚，亚·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著名创造者之一，受到了无愧于他对人类文化巨大贡献的尊重与敬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国富论》的研究

〔东德〕B·克努兹教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研究亚·斯密学说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国富论》的第一个德文译本出版于1776年。1923年又出了该书德文版。这些版本现已成为图书馆馆藏珍品。同

时,翻译和批判地解释正文已不能满足当代的需要了。有必要准备亚·斯密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柏林经济科学研究院正出版一套新的经济学译著。其中已出版的有李嘉图、魁奈、西斯蒙第、圣西门和李斯特的著作。亚·斯密的主要著作将分三卷出版。

研究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亚·斯密思想的态度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的资料将在有关德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的第一卷中发表。该卷包括1848年以前的时期,将分析克劳斯、沙多利、刘杰尔对亚·斯密思想的反动。研究表明,亚·斯密经济学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歪曲了。

对亚·斯密学说的现代伪造者的争论也给予很大注意。1975年在哈勒举行的纪念亚·斯密主要著作200周年讨论会的情况表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从亚·斯密著作到马克思著作之间的联系,贬低斯密价值学说的意义。这一点,也为前不久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纪念亚·斯密的会议所证实。

波兰对亚·斯密理论遗产的分析

〔波〕C·玛列茨卡亚教授

波兰人民共和国在研究亚·斯密著作上作了很多工作。例如,在华沙大学举行过科学讨论会,对斯密著作及其对波兰经济思想的影响作了总的估价,并讨论了一系列有关问题,其中包括:亚·斯密对扩大再生产问题的提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对扩大再生产的提法;以及同劳动有关的一些问题: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劳动条件,工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解决这些问题对现代有很大意义。

例如，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说（马克思发展了这一学说），在现代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当服务领域迅速发展时，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问题。

分析亚当·斯密的方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它的评论，对研究当前社会主义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指出，亚·斯密错误的根源在于，作为一位学者，他的立场是片面的，他的眼光有局限性，由此便造成了他的著作的矛盾与不完整。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亚·斯密观点体系的批判分析表明，他们看到了其中进步的真正科学的地方。即使对亚·斯密的一系列错误原理，他们在揭示招致错误的原因时，也指出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